

太平天國運動

范文瀾 著

目 錄

引 言	一
一 太平革命準備時期	七
二 太平革命勝利時期	一八
前期革命形勢——飛躍	一八
後期革命形勢——停滯	二二
三 太平革命衰敗時期	四一
前期革命形勢——防禦	四一
後期革命形勢——破圍失敗	五三

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創造了世界市場。自從南京條約訂立，五口通商，中國以半殖民地資格，進入世界市場了。閉關時代，人民受封建剝削，已經極其痛苦，鴉片戰後，又加外來的資本主義剝削，這種新式剝削，破壞中國手工業，使數千年來小農業與家庭工業合成一體的社會機構開始在某些地區趨於瓦解，更嚴重的是促進滿清統治者在全國範圍內猛烈增加封建剝削的強度，繁重得難以負擔的舊捐稅上，又加上新捐稅，填補賠款和鴉片貿易的虧額。鴉片戰後十年間，中國社會驟然遭遇這樣史無前例的大變動，不論南方與北方，城市與鄉村，全部震盪起來，舊的財政、經濟、政治、禮教各種制度，愈更成爲中國人民的禍害，新的人民的反封建革命運動，就在這樣時代條件之下是必然要發生了。而揭開這民主主義革命序幕的，就是馬克思稱爲「處於社會革命底前夜」的太平革命。

那時，以英國爲首（它佔中國進出口總額四分之三）的外國侵略者與滿族皇帝爲首的封建剝削者，給予人民最大的痛苦，試看下列事實，英國的鴉片、滿清的暴政，顯然是痛苦的源泉。

英國輸入紡織品價額表（單位千金磅）：

	棉織品	毛織品
一八四二年	四七〇	一四六
一八四三年	六五五	四一七

一八四四年——四六年，輸入額增長，到四七年開始低落，此後十年，輸入額平均說來幾乎沒有變動。這說明英國布疋對中國紡織手工業起了破壞作用，但不是嚴重的。輸出方面，中國絲茶逐年增長，在中英合法貿易上總是佔優勢，足夠抵補布疋及其他商品的價值而有餘。英國對華經濟侵略，主要依靠可恥的鴉片貿易，從南京條約成立時起，鴉片貿易享有不可侵犯的權利。大量輸入中國，每年換取等於數百萬金磅的銀兩出口。從一八四〇年——五〇年，英國輸入鴉片箱數如下

一八四四年	一、四七五	五六五
一八四五年	一、六三六	五三九
一八四六年	一、〇二四	四三九
一八四七年	八五〇	三八九
一八四〇年	二〇、六一九箱	
一八四二年	三三、五〇八	
一八四四年	二八、六六七	
一八四六年	三四、〇七二	
一八四八年	四六、〇〇〇	
一八五〇年	五二、九二五	

十年間鴉片輸入增加一倍以上，消費者主要是統治階級中人，他們行施各種搜刮方法，強迫人民償補耗失的銀兩，鴉片貿易繼續上漲，正與政治愈益腐朽，剝削愈益殘酷，銀源愈益枯竭，人民愈益困窮成平行線發展。當時全部政治機關兇暴貪污，比鴉片戰前更甚，連會國海那樣殘忍的漢奸，也不

能不認爲「百姓顛連窮苦」，舉出一些「民間疾苦」，勒告咸豐帝「務思所以更張之」了。照會國藩備陳民間疾苦疏所說：第一是「銀價太昂，錢糧難納」——「昔日兩銀換錢一千，則石米得銀三兩（每石平均價三千文），今日兩銀換錢二千，則石米僅得銀一兩五錢。朝廷自守歲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賦。州鄉竭全力以催科，吏役四出，晝夜追比，鞭扑滿堂，血肉狼藉。民之完納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則鎖拏同族之殷實者而責之代納，甚者或鎖其親戚，押其鄰里，真有日不聊生之勢」。這裏所謂小民，當然不是地主富農，這種人或與官吏勾結，朋比爲奸，或放高利貸，兼併土地，與其說受加賦之害，不如說受加賦之利，土地集中現象在鴉片戰後特別緊張，地主富農因中小農破產，經濟反趨繁榮，鴉片銷路也順利擴張了。那時候中小農民生活的窮困是難以形容的，例如江浙產米地區，米一石平均價值錢三千文。銀價在道光初年，每兩換錢千一二百文，道光十八年，換錢一千六百文，二十五年，京中換錢約二千文，外省換錢二千二百文，農民賣米所得，以錢折銀，實際減縮一半左右。官府徵收地丁，定價銀一兩，道光十九年，收錢一千八百八十五文，後漸增至二千餘文以至二千八九百文，總比市價高數百文。農民完納地丁銀一兩，歷年遞增至需賣米一石，再加漕米折銀，每畝又需賣米數斗，平常年景，一畝產米一石五六斗至二石，完納地丁漕米，已經剩餘無幾，暫時拖欠就遭血肉狼藉的慘刑，破產更不可免，因此他們唯一的生計是壓縮自己的生活費，限於豆麥蠶桑……等副產範圍內，一遇天災疾病及其他意外事，副產不夠養生，當然成爲高利貸者的犧牲品。佃農僱農生活尤其惡劣，上等佃戶耕田二十畝，每畝所費種籽、肥料、牛具、農器、農忙幫工等約一千文，春季缺糧必需填補，一般向當地富戶借貸錢米，秋收時加倍償還。每畝產米不過二石，還田主租米二十石，還債主錢四十千，米十幾石，剩餘極微，經營副業，又需借入本錢，支付重息。

中下等佃戶負債更多，終身不能脫離高利貸的盤剝。僱農工資通常每年十千文，無力娶妻成家，依附僱主過奴隸生活，是農民中最苦的一級。因地主富農急速發展，中小農戶繼續破產失業，多數轉入僱農或流民羣中，人口過剩成爲社會極嚴重的危機，只有革命才是出路。

第二是「盜賊太衆，良民難安」——「兵役平日皆與盜通，臨時賣放，泯然無迹，或反借盜名，以恐嚇村愚，要索重賄，否則指爲盜夥，火其居而械繫之。又或賣成族鄰，勒令縛盜來獻，直至縛解到縣，又復索收押之費，索轉解之資。故凡盜賊所在，不獨事主焦頭爛額，卽最疏之戚，最遠之鄰，大者蕩產，小者株繫，比比然也」。這裏所謂盜賊，實際正是飢民抗富戶，真正盜賊，都是全部行政機關，從官吏到兵役，無不「焚燒民房，訛索財物」，借口捕盜，實行燒殺搶奪，殘暴遠非普通盜賊可比。

第三是「冤獄太多，民氣難伸」——「人民控告官長吏役，大率皆坐原告以虛誣之罪，而被告者反得脫然無事，一家久訟，十家破產。往往有織小之案，累年不結，顛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聞之髮指」。這裏所謂冤獄，實際就是法律保障食污。統治階級的法律必需僞裝一些公正面目，才能欺騙人民，現在真面目完全暴露，法律喪失信用，「令人髮指」的原因在此。

會國藩代表一部分缺乏政治勢力的有產者訴苦，社會極大多數窮民的冤苦，他是不理會的。但僅就這三條說來，滿清官僚政治的黑暗，農業生產的摧殘，足夠證明人民要求革命的正當了。他在「議汰兵疏」裏又說「兵伍之情狀，吸食鴉片，聚賭賭場，各省皆然。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滿清養綠營兵七十萬，八旗兵二十五萬，全國分駐一百萬武裝強盜，配合號稱官員吏役的文法強盜，共奉滿洲皇帝爲渠魁，一致向人民敲剝，悍然不顧。這樣兇惡的一具統治機器，止有對滿洲貴

族漢奸、地主、富農、外國侵略者有存在必要，從人民方面看，除了搗毀它，再沒有自救的道路。

中國人民反抗滿清，從來不曾停止，鴉片戰爭前後，南北各省反滿秘密結社，非常發達。被統治階級發覺的已經是名號繁多，實際並不止這些。例如咸豐元年七月戊子上諭「近來四川之囑匪、河南之捻匪、湖南之齋匪、湖北之痞匪，以及山東安徽匪徒，結黨成羣，幾於所在多有」。事實上捻黨散佈河南安徽山東一帶，爲北方白蓮教天理教兩次大起義以後新起的大勢力，齋教散佈湖南、江西、福建、浙江一帶，爲兩宋魔教（北宋末魔教主方臘起義）的流派，都不是僅限於一省。勢力尤大的天地會（又稱洪門、三合、三點），分長房福建、二房廣東、三房廣西、四房兩湖、五房浙江，會員布滿南中國，以「反清復明」爲共同宗旨。其他小派別，單是湖南一省就有串子會、半邊錢會、一股香會、紅黑會、紅簿教、黑簿教、結草教、斬草教、捆柴教等名目，各省秘密結社大致相類，這種散漫小規模的結社，不論它思想如何愚昧，方法如何落後，本質是窮苦人民反抗統治階級的一個力量。從鴉片戰爭起，大小會社日益擴大的規模發動武裝起義，較著稱的有如下列：

一八四一年——湖北崇陽縣人鍾人杰聚衆數千人起義，自稱鍾勒王，並豎都督大元帥紅旗，次年戰敗被殺。

一八四三年——湖南武岡州人曾如炷起義。

一八四四年——臺灣嘉義縣人洪協等起義。湖南耒陽縣人楊大鵬等聚衆抗糧起義。

一八四五年——清山東巡撫發兵捕殺捻黨。

一八四六年——雲南永昌回民起義。湖南新田縣人王宗獻起義。江蘇昭文縣人金得順等起義。

一八四七年——天地會首領雷再浩、李世得等起義，進攻全州，湖南廣西天地會員籌備響應。

一八四八年——清廷諭兩廣、湖南、江西各督撫嚴擊天地會員。

一八四九年——廣西大饑，鄉村間饑民千百成羣，向富戶借貸錢米。富戶辦團練，藉口保全身家，請州縣官出示，特准對饑民「格殺勿論」。統治階級的殘忍性完全暴露，天地會和饑民紛紛起義。揭「官逼民變」、「天厭滿清」、「朱明再興」、「替天行道」、「認富救貧」等旗號，攻佔城市，誅戮官吏，聲勢大振。廣西一省起義軍多至數十部，每部有衆數百人以至數千人，其中大部如湖南新寧縣天地會首領李元發，佔據廣西、湖南、貴州三省邊境，三省天地會起兵響應，元發遭清兵圍攻，戰敗被殺。又廣西貴縣盜魁張嘉祥（降清後改名張國樑），迎合飢民心理，提出「上等的人欠我錢，中等的人得覺眠，下等的人跟我去，好過租牛耕瘦田」四句口號，大得貧苦人擁護，在各部中兵力最強。不久張嘉祥戰敗，投降清軍，成太平天國的勁敵。當時清兵腐朽不能作戰，止是利用天地山會堂分立，缺乏統一指揮，盜魁貪得小利，並無政治思想等間隙，居然收各個擊破、壓反抗者、賄買反革命走狗的功效。可是太平革命軍與其他起義軍不同，它有堅強的軍事組織、統一的宗教信仰、顯明的政治綱領、強烈的民族意識，繼各部起義軍失敗之後，衝破清兵包圍，展開偉大場面，這決不是偶然的。

一 太平革命準備時期

——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至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

商品、基督教、大砲是西方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整套工具。基督教裝着偽善的面貌來掩護掠奪政策，開大砲屠殺是侵略者的另一面貌，總目的在暢銷商品，主要是鴉片。馬克思說「歷史之所以需要麻醉中國人民，爲的是要把他們從歷來的愚昧狀態中喚醒起來」。的確，鴉片使中國統治階級愈益腐爛，對中國人民却「不會發生催眠的作用而倒發生了驚醒的作用」。太平運動採用基督教某些教義作爲反封建思想的根據，這也是因鴉片而驚醒的一種表現。

一八〇七年（嘉慶十二年），英國傳道會派遣瑪禮孫博士到廣州傳教，譯耶教聖經成華文。他的第一信徒梁亞發著一種傳道書叫做「勸世良言」，在路上分發宣講。一八三七年，洪秀全到廣州應秀才考試，無意中得「勸世良言」。秀全是天資聰明，熟讀經史很有才學的青年士人（二十五歲），他在科場屢次失意，激起反抗思想，試罷歸家，裝瘋病四十餘日，說自己上天堂受了上帝的天命。這是歷史上「符瑞」「受命」的舊方法，與魔教拜日月神白蓮教拜彌勒佛，同一意義，只用作號召民衆的旗幟。秀全病中吟詩有「手握乾坤殺伐權，斬邪留正解民懸」；「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爲家共飲和，擒盡妖邪投地網，收殘奸軌落天羅」等句，純屬政治性質，並無顯著的宗教色彩，洪秀全與基督教的關係僅利用上帝耶穌兩個名詞宣稱自己受了天命。

一八三八年、四三年，秀全兩次應試，又遭失敗。那時候滿清政治軍事的全部能力在鴉片戰爭中完全暴露，他決心拋棄科舉，實行起義準備。他和同窗馮雲山等研究勸世良言，附會書中詞句，證明本人確實接受了上帝耶穌的天命，他創立上帝教，勸人在上帝面前悔罪，不事邪神，不行惡事，遵守天條。秀全雲山都是貧苦塾師，他們不顧失業的困難，把孔子牌位毀棄，結果學童驚散，書館停閉，不得不離開花縣本鄉，遠赴廣西傳教。封建社會的「至聖」孔子竟被看作邪神，這在中國思想史上是破天荒的大事。

一八四四年，秀全雲山到廣西貴縣傳上帝教，農民百餘人受洗禮入教。一八四五年，雲山轉入桂平縣紫荊山向曠工宣傳，秀全回花縣製造傳教文書。原來上帝教只有一些簡單教義，主要是不拜偶像邪神，獨拜真神上帝，信奉耶穌，可得天堂永久快樂。這種教義不能號召廣大羣衆，需要理論的補充，秀全作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論兩篇，確掌握了窮苦人民的心理，初步發動反抗的熱情。救世歌勸人要作正人，切戒「淫」、「忤父母」、「行殺害」、「爲盜賊」、「爲巫覡」、「賭博」，六個不正行爲。他在戒條裏輸入政治上的平等思想，說「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主私自專？上帝當拜，人人所同」，「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視之皆赤子」。天子的稱號和祭天的特權，一向歸皇帝獨佔，人民是皇帝的奴隸臣妾，「僭」號「侵」權便是大逆不道。人民都自稱天子，都有權拜自己的天父，恰恰破壞了封建制度的等級精神。因爲人人都是兄弟，殘虐成性的統治階級自然是「嗜殺人民爲草寇，到底豈能免禍災」。人民殺草寇完全是正義，戰爭所引起的禍災完全是草寇的罪惡。

醒世論裏又灌輸經濟上的平等思想。他根據「皇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這個原則，說「天下（世界）多男人，盡皆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羣，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爾吞我併

之念」。顯然，那些滿洲人、官吏、地主、高利貸者剝削吞併，都是反「上帝之真道」的妖魔，必需殺逐，才能「天下一家，共享太平，變凌奪鬥殺之世爲公平正直之世」。他引述孔丘「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是謂大同」一段話，想實現「有無相恤，患難相救，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男女別塗，舉選上德」的太平世界。這種主觀的社會主義（馬克思稱爲「中國的社會主義」）要求，根據無貧富之分的新原則重新分配財產，製定天朝田畝制度。當馬克思在歐洲創造科學社會主義的時候，洪秀全提出了「中國的社會主義」，雖然是空想，却顯示出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氣魄。

政治上經濟上兩大平等，是在封建壓迫之下困苦不堪的廣大人民主要是農民迫切要求，也是中國社會進一步發展的必要條件。救世醒世兩篇論文，剝去它的宗教外衣，就可以看出它的民主主義思想的本質，太平革命運動就在這個平等思想推動之下壯大起來。

「太平天國起義記」載當時秀全對族弟洪仁玕的秘密談話說：

上帝劃分世上各國以洋海爲界，猶如父親分家產於兒輩，各人當尊重父親之遺囑而各自保管其所得之產業，奈何滿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國而強奪其兄弟之產耶？

又說：如果上帝助吾恢復祖國，我當教各國各自保管自有之產業，而不侵害別人所有，我們將要彼此有交誼，互通真理及知識，而各以禮相接，這是我心中之大願也。

這是秀全的民族平等思想，一八四六年，秀全依據這個思想作原道覺世訓，覺世訓是指出戰鬥目標的論文，它反覆說明「閻羅妖乃是老蛇妖鬼也，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所當共擊滅之惟恐不速者也」。所謂閻羅妖，實際就是人間的滿洲皇帝，文中所謂「閻羅妖之妖徒鬼卒」的各種偶像，就是人間的官吏地主等一切民賊。統治者口口聲聲責備人民「食毛踐土，具有天良」，應該感戴皇恩，覺世訓却說皇

上帝造天地萬物，保佑八有衣有食，人明明沾皇上帝的恩典。那些邪魔敢冒天恩，該誅該滅，那些感戴邪魔恩典的人是「良心死盡，大瞞天恩，究與妖魔同犯反天之罪，何其愚哉」。他把上帝與閻羅妖對立，勸告人民脫離妖魔的迷惑，獨拜真神皇上帝。又把皇上帝與人民間皇帝對立，認為「他是何人，敢視然稱帝，妄自尊大」。在迷信神權王權的社會裏，給人民一種勇氣敢於反對偶像閻羅妖及皇帝，不管勇氣的來源出於宗教迷信，到底起着革命的作用，就宗教說，一神教比多神教拜物教也是大進一步。醒世，救世，覺世三篇的製成，奠定了太平革命的理論基礎。後來同盟會倡導三民主義，遠源也是這三篇。

一八四七年，秀全離花縣到廣州禮拜堂從美國牧師羅孝全學耶穌教義，得讀新舊約聖經。他學了些對上帝禮拜的儀式，就去廣西尋馮雲山，在紫荆山設立上帝會機關，共同製定上帝教各種儀式及十條天條。它把人生日常動作，都表現為一種宗教儀式與上帝聯繫起來，教徒集會禮拜有讚美上帝詩，入教受法有悔罪奏章，朝起夜睡有拜上帝祈禱文，吃飯有感謝文，其他如災病、喜慶、喪葬、生日、滿月、迎親、嫁娶、作灶、做屋、堆石、勸土等事，都有祭告上帝奏章。禱文大意不外「祝福有衣有食，無災無難」，「誅滅妖魔，萬事勝意」，「今世見平安，昇天見永福」一類免禍得福的願望。統治階級中各個等級都有權壓迫人民，因之幻化為各種偶像鬼神都有權血食，上帝教集中禍福大權在一個皇上帝，也就是只承認一個人民自己的權力，這些迷信瑣碎的儀式，却成為組織革命羣衆的重要方法。

十條天條模倣摩西十誡，前四條屬宗教信仰，後六條即救世歌所舉六不正的條文規定，在平時當作教徒的生活法則，戰時變為軍事紀律（上帝教徒死後不用棺木，只用布帛裹屍體，也是為戰爭便

利)天條比禱告儀式有更大的組織作用。

上帝教具備了理論和組織，派人四出宣傳，教徒人數大增。秀全與雲山等寫奏章祈禱上帝，秘密著髮，選擇紫荊山險固地方作根據地，聚集會衆準備起義。爲要鼓勵會衆的誅妖勇氣，秀全率馮雲山等往象州搗毀甘王廟。甘王是殺母、食暴淫亂的著名鬼神，象州人怕它作怪降禍，祭祀非常虔敬。秀全入廟宣布甘王十大罪狀，舉大竹杖擊毀神像。從此秀全威名大振，入教人愈衆。上帝教徒到處破壞廟宇偶像，宗教信仰轉成宗教鬥爭。地方紳士認爲拜會謀叛，起團練擒獲雲山等送桂平縣獄，會衆籌集數百串錢營救雲山出獄，宗教鬥爭轉成政治鬥爭。一八四七年，上帝教起義準備初步完成了。四八年至五〇年，上帝教與團練鬥爭愈益尖銳，起義準備成熟而爆發了。

一八四三年秀全創教，四四年到廣西傳教，四五年製造宣傳論文，四七年定組織規章，建立起義根據地，開始革命行動，前後五年，上帝教竟成有實力的革命團體。五〇年起義前，以桂平縣紫荊山爲中心，西到貴縣，東到平南、藤縣，南到博白、陸川，北到武宣、象州，在黔甯兩江流域的村落和山嶺裏，都散播了上帝會的種子。這樣迅速的發展，主要由於滿清統治腐爛不堪，人民不能生活下去，主觀方面利用宗教迷信推行平等思想與組織，配合了客觀的革命要求。

一八四八年以後，上帝教與地主武裝團練進行着激烈的鬥爭，正如李秀成自傳所說「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兩有分別，拜上帝人與拜上帝人一夥，團練與團練一夥，各自爭氣，各自逞強，因而逼起。」在鬥爭發展中，洪秀全馮雲山二人組成的領導核心當然需要擴大，陸續加入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四人，最後加入洪大全，成立七個人的領導集團。這個集團的結合與分裂，決定太平革命的勝利與失敗，這裏就必需敘述七人的階級成分及簡史。

洪秀全——廣東花縣客家人。中農家庭，父兄耕田謀生，家境窮困。秀全七歲（一八一九年——嘉慶二四年）入塾讀書，聰明異常，五六年間，熟讀四書，五經，孝經及古文多篇，父兄和親族都希望他科舉成名。十六歲因家貧失學，助父兄耕田。十八歲（一八三〇年）受聘爲本村塾師；直到三十一歲（一八四三年）創立上帝教以前，不會離開村塾教師的職業。一個讀經史多年，功名心極重，屢次應試得不到秀才的失意人，悲憤不平，在鴉片戰爭後，走向革命道路是很自然的。他的學問知識可以創教作教主，但實際傳教的是馮雲山。領導羣衆的是楊秀清，教主與教徒中間隔着一個媒介體，這使他脫出簡單的塾師生活，又進入高高在上的教主生活，不能積累起豐富的政治、軍事經驗去實際領導太平革命。

馮雲山——花縣客家人，與秀全同窗，也同是有才學考試失意的窮苦塾師。秀全創教，雲山首先受洗。一八四四年，二人到廣西貴縣傳教。不久，秀全歸家製造宣傳論文。雲山留桂平紫荆山，親身挑泥挖土，充當苦工，向附近各山燒炭工人，礦工及農民宣傳新教。到四七年秀全回紫荆山時，信徒已有數千人，造成雄厚勢力，號稱「拜上帝會」。二人共訂宗教儀式及天條，開始作起義準備。雲山被團練捕獲押入縣獄，秀全回廣州設法營救，楊秀清等燒炭工人等集錢數百串充賄賂，四八年初，雲山得釋放歸山。教徒人人歡欣，即時殺牛宰馬，獻祭上帝，感謝天恩。雲山出獄後往花縣尋秀全，四九年六月才同行歸山。他是上帝會主持者，離會一年以上，不曾指定代理人，會衆無人統率，發生分裂現象，這是極可惋惜的。

楊秀清——桂平縣平隘山客家人。世代以燒炭種山爲業。秀清幼年喪父母，曾離家流蕩，五口通商前，結夥伴護送洋貨，交結許多兩廣江湖上豪客。上海開埠，廣州國際貿易衰落，秀清失業歸家，

仍作燒炭工人，他「識字無多，奸譎異常」（「賊情彙纂」），所謂「奸譎」，就是他的閱歷和智謀高出一般人。馮雲山出獄回花縣，會衆發生動搖，楊秀清自稱上帝附身顯聖，發布號令，團結會衆。這在當時也還是必要的手段，秀全回來，不得不追認聖言，從此代上帝傳言的大權專屬秀清，洪、馮都是廣東籍，不及秀清與羣衆有鄉土關係，再加上帝附身，秀全要跪地聽命，甚至受杖責，秀清權力在羣衆中提高到第二教主的地位。馮雲山不幸早殺，秀清掌握軍事政治權全部及宗教權半部，秀全權不稱位，潛伏着後來楊韋內訂的禍根。

蕭朝貴——武宣縣農民，破產流落，糾合勇士入山，護送往來商客，與楊秀清結識，約爲義兄弟。廣州商業轉移上海，楊，蕭失業，同入上帝會成羣衆首領。秀清稱上帝附身，朝貴稱耶穌附身，後來都被洪秀全承認有代言權。秀清多智謀，朝貴忠實坦率，勇敢剛強，衝鋒第一，代表農民的革命性。楊、蕭關係較深，秀全妹宜嬌嫁給朝貴，增強洪、楊兩方的結合。朝貴在攻長沙時戰死，與馮雲山早死同是重大的損失。

章昌輝——桂平縣金田村人，地主兼典當商，爲一縣首富，捐得監生名目，出入衙門辦事，又是豪紳身分。一八四九年，廣西飢民發動分糧，富戶多破家，昌輝獨能慷慨施予，得本縣一部分民衆擁護。上帝會勸昌輝入會，借他的紳富名義和資財，組織保良攻匪會，掩護革命活動。他出身剝削階級，貪污官吏指爲謀反，被迫參加金田起義，在太平軍領導集團中是唯一壞分子，後來楊韋內訂，大局敗壞，他是主要負責者。

石達開——貴縣北山里客家人。石家是當地土豪大姓，人口多，富有財產。達開讀書有才志，文武備足，加入保良攻匪會，同謀革命。章、石二人都是當地多年紳富，各擁有一部分羣衆，他們對上

帝會關係較淺，在領導集團中地位也較低，因之達開雖是第一等軍事政治人才，却不能取得洪、楊的絕對信任。

洪大全——湖南衡山縣人。他在供詞裏自述「自幼讀書作文，屢次應試，考官不識我文字，屈我的才，就當和尚。還俗後，又考一次，仍未取進。我心中忿恨，遂飽看兵書，欲圖大事。天下地圖，都在我掌中，古來戰陣兵法，也都留心。」他和洪秀全一樣，應試失意，轉向革命。秀全接觸一些西洋文化，創造平等思想的上帝教，大全生長在內地，只能組織舊形式的天地會，自然，上帝會是有前途的。可是天地會勢力浩大，大全遊行兩廣兩湖各地，結識山堂首領，擁有廣泛的羣衆。上帝會是新起的，一個地區的團體，羣衆基礎遠不及天地會。金田起義後，大全以天地會大首領軍事專家資格前來合作，上帝會推尊他爲天德王，居次於洪秀全的地位，是有政治意義的適宜處置。洪大全的真姓名是焦大，參加起義後，改稱萬大洪。「朱」、「洪」、「萬」都是天地會的貴姓，（天地會員尊率萬壽龍爲開山始祖），他對天地會用萬大洪姓名，爲的便於號召會黨，對上帝會又用洪大全姓名，表示與洪秀全有兄弟對等的關係。一八五二年（太平天國二年咸豐二年）萬大洪在永安圍城中，用「天德」年號頒發告示，對湘鄂二省以及江西江南一帶人民號召「將各府州縣之賊官狼吏盡行除滅，救民於水火之中」，全篇不見一句宗教語，與上帝會開口必稱天父天兄顯然不同，太平天國用陽曆，天德仍用陰曆（但承認太平曆），太平天國領導人稱王，萬大洪自稱總理軍機天下大元帥（又有都督大元帥稱號），不受天德王名義。天地會沿用「天德」二字以爲理想中小主的年號（起於康熙時張念一奉朱三太子起義），非朱姓的起義人多自稱大元帥（如一八五〇年廣州發現天德二年漢大明統兵大元帥黃告示），萬大洪即洪大全，是天地會首領毫無疑問。他承認「奉天承運太平天國」，洪秀全討清詔書

裏，也自認「今朕非他，乃大明太祖之後裔，弘光皇帝七世孫」，在復明反滿一點上，天地上帝二會是可以合作的。

以上七人，從團結方面說，在太平天國名義下，一致反對滿清統治者，農民、手工工人、運輸工人、會黨、流氓、以及一部分失意的士人、被欺壓的地主商人，都有代表參加了這個領導集團，形成龐大無比的革命聲勢。滿清首席軍機大臣賽尚阿在永安戰敗後，感到「此賊不是尋常的賊，總願旁人不要同我一樣才好」，這就是團結所表現的威力。但從紛歧方面說，首先是上帝天地二會存在着裂痕。上帝會崇拜一個真神，楊秀清代真神發言，因之楊秀清等於真神。天地會標「反清復明」為宗旨，並非宗教團體，洪大全在自述裏說「妖術行爲，古來從無成事的」，他不能聽從楊秀清指揮，可以推見。其次是上帝教本身，洪馮爲一組，楊蕭又爲一組，洪馮創教，楊蕭代上帝耶穌發言，宗教領導二元化，隱藏着分裂的嚴重危機。章石實際上並非上帝教信徒，章被迫參加，石「讀書有大志」在一定時機下，章可以爭權內亂，石可以負氣獨立，簡單的宗教迷信是不能束縛他們的。洪馮蕭三人早死，洪楊章石四人間紛歧的因素繼續發展到分裂，蓬勃的太平天國也就由衰弱而至於崩潰了。

太平革命的基本羣衆，在金田起義時，一般是廣西人、客家人、上帝會人（教徒總數約三千人）。按職業區別，有下列二類。

第一類羣衆：

燒炭工人——上帝會主幹之一，首領楊秀清，肅朝貴。上帝會人多數燒炭爲業，俗稱爲炭黨，集中地在桂平縣平隘山。

礦工——道光年間，貴縣招集客家人開掘銀礦，馮雲山入北山里龍山中，宣傳上帝教，成爲上帝

會主幹之一。起義參加者約千餘人。

客家農民——廣西地廣人稀，廣東或鄰省客家人多遷來墾田謀生。客家村落不及本地土人村落強大，常被土人掠奪，彼此感情極惡，往往尋仇械鬥。一八五〇年，貴縣土客發生大械鬥，客家戰敗，男女老弱三千餘人棄田產逃走，隨北山裏鑛工隊加入金田起義，成爲主幹之一。

這一類工人農民數千人是太平軍最基本的戰士，其他陸續參加的，正如李秀成自述：「從（入教）者俱是農夫之衆，寒苦之家」太平軍中農民佔大多數，不限於客家人，也不限於先入上帝教，他們的共同信仰是「同家食飯」、「自由平等」。

第二類羣衆：

章昌輝部屬約一千人，隨章輝參加起義。這羣人有農民、商人、流氓，後來一部分結成章黨。

變兵——金田戰前一天（十一月二十八日）清軍中客家軍人數千反清加入太平軍。

會黨——金田起義，洪秀全允許三合會首領八人率部加入，條件是同拜上帝及遵守會規（天條）。其中七人嫌會規太嚴，相率退出。獨有羅大剛愛太平軍的紀律及教義，改奉上帝教。此後，「秀全誠其部屬不再收容三合會人物於其軍中，惟其甘自改變舊習而遵從真蓮者始行納之」（韓山文太平天國起義記）。

交通運輸業失業者——鴉片戰前，廣州是唯一通商海口，出入口貨經兩條大路，一路起廣州經大庾嶺沿贛江北上至九江，一路起廣州經南風嶺達湘潭。容闈「西學東漸記」說「湘潭及廣州間，商務異常繁盛，交通皆以陸，勞動工人肩貨往來於南風嶺者不下十萬人」。兩路水陸運輸護商旅店、商販等業及依附爲生的人數當不下百萬。商業中心移到上海，兩廣贛湘驟增百萬失業者，腐朽的社會是經

不住這個地震般的劇變的。他們要求生活，就必須反抗社會舊秩序，參加太平軍的如楊秀清、蕭朝貴、吳如孝（封願王）羅荪芳都是這一類人，其餘不知名的當不在少數。不過天地會影響遠比上帝會大，萬天洪告示，主要就是對這羣失業者發出號召。

被迫參加者——太平起義記：「清軍戰敗，遷怒於新墟居民，焚燒一二千舖戶而搶掠財物，且又捕殺居民多人，故加以逆黨或助逆之罪。此等殘酷行爲令人民憤激不勝，許多人留在家中本欲拜上帝而不願加入革命運動的，至是迫得離家而投入洪軍」。

這一類人品類較雜，但在宗教信仰軍事紀律的統一領導下，也成爲重要的革命戰士。

以上兩類到金田起義前後，總數已達萬人。這是堅強統一的團體，具備政治思想、組織領導集團、基本羣衆、人民同情擁護等必要條件，從創教到起義不過八年，準備完全成熟。容闈說「予意當時即無洪秀全，中國亦必不能免於革命」，自然，革命並非少數人的製造品，但洪秀全能首先提出並實行反封建革命，雖然因幼稚錯誤而不免失敗，他個人所起的倡導作用，還是不容否認的偉大成就。

二 太平革命勝利時期

——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至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

本時期可分前後兩期。前期從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六月金田起義至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二月攻克南京，革命形勢飛躍的發展；後期從咸豐三年二月建都南京至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八月楊韋內訌，革命陷入停滯狀態。從飛躍到停滯，完全由於領導集團裂痕的加深與戰略指導的錯誤，滿清方面却因此獲得重新調度反革命力量的機會。

前·期·革·命·形·勢——飛·躍·

上帝教徒到處搗毀廟宇偶像，與地方紳士衝突日趨激烈，各教徒感覺有聯合一體共禦公敵之必要。彼等將田產屋宇變賣，易爲現金，而將一切所有繳納於公庫，全體衣食俱由公款開支，一律平均。因此均產制度，人數愈爲加增，而人人亦準備隨時可棄家集合」（太平天國起義記）。革命羣衆的鬥爭情緒高漲到如此程度，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太平軍在紫荊山前金田村，公開豎立義旗，陸川、博白、花洲（屬平南縣）、白沙（屬桂平縣）各地也同日起事。十月，各地會衆到達金田。十一月，大破清軍。咸豐元年閏八月攻克永安州（蒙山縣），建立太平天國。

太平軍駐永安城半年，頒行各種制度，建國規模大體具備。秀全被推爲太平天王，再由天王大封官職。王是最高官職分四等，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列一等，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列二等，翼王石達開列三等，「以上各王，俱受東王節制」。太平天國政制、軍制、曆法都是馮雲山訂製，他當然知道節制權應屬天王，但楊、蕭取得代天父天兄發言權，事實上秀全早受楊、蕭主要是楊的節制，論宗教地位之起義功績，雲山不在楊、蕭下，也因同樣事實，不得不退居第三位。領導集團內部的分歧，在建國開始，已顯示分裂的危機，這個危機又是在發展而無法克服的。

太平軍初起，清軍每戰必敗，咸豐部派首席軍大臣賽尚阿督大軍圍攻永安城。咸豐二年二月，城中糧盡，太平軍突圍，大破清軍，殺四個總兵官，乘勝進攻桂林。在突圍中，洪大全被清軍俘獲，這是巨大的損失。天地會有廣泛的羣衆基礎，有二百年的反滿歷史，有自己崇奉的萬雲龍大哥和五祖，有傳統的組織形式和特殊習慣，另一方面，它沒有上帝會那樣統一組織與嚴格紀律，這些，都阻礙了它和上帝會的合作。洪大全在承認太平天國天王是「明太祖後裔」兩個條件下，用天德年號天下大元帥名義與上帝會聯合，地位是對等的。這一聯合形式的發展，不僅天地會可在政治經濟平等的思想基礎上合作，就是北方的捻黨、白蓮教、西北的回民、西南的苗民，也可以同樣聯合，協力行動，這種反滿大聯合，足夠保證革命的勝利。洪大全被俘，天地會失去有力首領，此後天地會員或單獨起義，或改奉上帝加入太平軍，不成爲一個對等聯合的力量。上帝會也從此合併拜上帝與革命爲一事，不許太平軍中有非上帝教徒。上帝會與各種反滿勢力不能合作，從永安突圍後開始，所以太平軍喪失洪大全，對革命前途有極嚴重的意義。

桂林是廣西反革命的中心地，提督向榮、狀元龍啓瑞率綠營兵、團練固守，不敢出戰。太平軍聞

雲梯猛攻，婦女助戰，兒童吶喊助威，但清軍有槍砲，太平軍不能取勝，解圍北上攻克全州。從全州到湖南路上，馮雲山戰死。雲山死後，洪秀全勢更孤弱，大權全歸楊秀清。太平軍進攻長沙，沿路收擊衆五六萬，其中挖煤工人數千，另立土營，專開地道攻城。蕭朝貴在長沙城下陣亡，太平軍圍攻兩月不能破，轉攻岳州，十月，克岳州。

咸豐二年二月到十月，太平軍損失三個領導人。當時缺乏戰爭經驗與攻城武器，將士全憑勇敢衝鋒，用血肉換取勝利。清軍不敢對陣作戰，專靠城池與槍砲，馮蕭都是中砲死的，桂林長沙都是靠槍砲守住的。太平軍痛感軍械的重要，在岳州獲得大量船隻及器械、槍砲、實力大增，改變「欲取湖南爲家」（李秀成自述）的計劃，決心進攻湖北。

十一月，太平軍自岳州水陸兩路並進，十二月，佔領武漢三鎮，咸豐三年正月，太平軍水師有船一萬艘，載糧食軍火財物蔽江東下，陸軍夾兩岸前進，水軍號稱五十萬人。沿路民衆踴躍從軍，聲勢浩大，清軍喪胆，望風崩潰。太平軍連克九江、安慶、太平、蕪湖，水陸號稱一百萬人。二月初八日，攻克南京。

南京的攻克，自然是革命一大勝利，但還不是滿清的致命傷。「此時天王東王尙是計及分軍鎮守江南，欲往河南，取河南爲業」（李秀成自述）這個計劃完全正確。證明後來林鳳祥李開芳率偏師北征，直到天津附近，嚇得咸豐帝「預料到北京快要失陷，詔諭各省巡撫將皇帝的收入送到行宮所在地熱河」（馬恩合著）。「亞洲與俄國」引一八五四年二月東方郵電）滿清勢力在北方空虛腐朽可以想見，如果此時天王東王率主力軍乘大勝餘威，長驅北上，滿清措手不及，除倉皇逃遁，決無他途可走，全國反革命失去滿洲主子，就是最兇惡的會國藩，也無法組織湘軍。可惜洪、楊對這一計劃是動

橋的，楊秀清確信一個湖南老水手，「河南河水小而無浪，敵困不能解救；南京乃是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餘」的話，決定計都南京。這說明太平軍領導思想上保守主義戰勝了進取主義，安富尊榮觀念戰勝了刻苦戰鬥觀念，總以是機會主義戰勝了革命主義。這個戰略上最大的失策，成爲太平革命失敗的決定因素之一。

太平軍另一大失策是棄地不守。岳州、武漢、九江、安慶等地，全部放棄，滿清官吏很快的恢復統治機構，殘殺革命民衆。如果派兵駐守，援助當地民衆反抗滿清統治，擴大革命佔領地，南京形勢也就會鞏固起來。太平軍不知守地，清欽差大臣向榮率盜魁張國樞自廣西尾隨在後，止隔十天，向榮到達南京城東孝陵衛，成立所謂江南大營。又一滿清大帥琦善率直隸陝西黑龍江馬步各軍自河南至揚州，成立所謂江北大營，南北兩大營都是些八旗兵綠營兵，不堪一戰，但政治影響對滿清有利。滿清在江浙上海搜括財物，供給兩大營，大批強盜流氓應募入營，兵力愈益強大，盜魁張國樞兇悍善戰，成爲主幹人物，它戰鬥力不及湘軍，但對南京是一個大威脅。

戰略上的失策，要引起嚴重的後果，但太平軍還有極大成功的一面，使它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造成堅強的基礎。這就是百萬人民的直接參戰與廣大民衆的擁護革命。太平軍從廣西出發，沿路誅戮妖魔鬼（官、幕、吏、役），焚燒衙門、糧冊、田契、借券，殺逐豪紳、地主、和尙、道士——這種人（除地主）多數是土地佔有者或高利貸者。人民驟脫封建剝削的束縛，感受革命所給的愉快是不可言語形容的。他們參戰，當然不是所謂脅從；擁護，當然不是所謂好亂。太平天國野史說「沒入財物，必擇達官富紳行之，民間則絲毫無擾也。且每以攫得衣物，散給貧者，並言將來治平，概免租稅三年，鄉民德之。湘楚之民，大有「奚我后，后來其蘇」之概，太平軍至則爭迎之，官軍至則罷

市」。這是事實，就是反革命渠魁曾國藩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事實，太平天國的基礎就建立在這個事實上。

滿清軍隊殺人、放火、姦淫、擄掠，根本不知有所謂紀律。太平軍恰恰相反，普遍保持極嚴格的軍事紀律。李秀成自述說天王駕入南京，開立軍伍，整立營規。東王佐政事，事事嚴整，立法安民，民心佩服。安民者出一嚴令，凡安民之地，何官何兵敢入民房者斬不赦。法律嚴，故癸丑（咸豐三年）年間，上下戰功利，民心服」。事實上太平軍紀律始終良好，連曾國藩也不敢否認這個事實，太平軍的基礎就建立在這個事實上。

太平軍戰略錯誤的影響剛在開始，而革命基礎却已迅速長成，這就是前期飛躍發展的原因。

後期革命形勢——停滯

太平天國定都南京以後，正式成立國家政權，軍事、外交、政治、經濟都是急待處置的重大問題，太平軍實際領導者楊秀清怎樣來處置這些問題呢？他是「才能極大」、「令嚴軍民畏」的剛強人物，他依據平等原則，建立起嶄新的天國制度，成績是偉大的，但錯誤也不小，使革命陷於停滯甚至釀成內部大變亂。

軍事問題

要剿滅滿清必須北征，要鞏固南京必須兩征，要斷絕滿清財源必須東征，太平軍處置三方面軍事基本上是失敗了。當時南北各地，民衆紛紛起義，對太平軍絕對有利。黃河流域捻軍大起，首領有張

洛行、李兆受、李士林、劉元吉、任二皮、龍得樹等，張洛行勢力最大；長江以南以至珠江流域，天地會到處發動，陳開起兵廣東佛山縣，黃威起兵福建廈門，劉麗川起兵上海最爲著名。此外較小事變真是不可勝數，例如湖南，照曾國藩說：「去年粵逆入楚，凡入添弟（天地）會者，大半附之而去」（咸豐三年二月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摺），但是他在「移駐衡州摺」裏表示驚慌失措，認爲「若非痛加誅鋤，則禍患將無了日。」他說：

數月之間，四屬匪徒屢次滋擾，如常寧有白沙堡之案，衡山有草市之案，永興有獅子寨之案，安仁有焚燬衙署之案，桂東有縣城失守，戕害把總之案，宜章臨武有廣東匪徒滋擾之案，永明江華有廣西匪徒竄入戕害千總之案。此外四屬中，聚衆倡亂、搶劫拒捕，爲案甚多，未及一上演聖聽。

這樣多的起義，證明在太平革命影響下，人民憎恨滿清已達頂點。曾國藩不認爲滿清統治完全破產，却描寫成「皆由上年粵匪經過衡、永、耒、桂一帶，裹脅最衆，或久投僞職，或飽掠潛歸，以致羈民構煽，甘心從逆，動輒貼粵匪之僞示，張太平之逆旗，甚至乞兒偷盜，三五成羣，亦敢倡言謀亂，毫無忌憚。」事實上太平軍不會經過的地區，同樣如火如荼在爆發。而太平軍佔領的地區，人民安居樂業，擁護太平軍。曾國藩自己供認：

伏查崇（湖北崇陽）通（通城縣）兩縣向爲匪徒嘯聚之區，自正月以來，居民多已蓄髮，樂爲賊用。其旁近州縣，如通山、蒲圻、大冶、興國、咸寧、嘉魚等屬，皆已僞賊所據，官兵到境，無土人爲之嚮導，無米鹽可供買辦，人心之壞，實堪痛恨（咸豐四年三月報崇通剿匪勝仗摺）。

根據上述例證，可以斷定太平軍無論北征、西征、東征都有可能獲得最大的勝利，但太平軍並不能利用這樣優越的形勢。

北征——太平軍克南京，即派林鳳祥、李開芳、羅大綱率兵攻下鎮江揚州二重鎮。洪楊計議北征，羅大綱主張「欲圖北必先定豫，車駕駐汴，軍乃渡河。若懸軍深入，犯險無後援，臣不敢奉詔。」洪楊不聽大綱這個正確主張，派林鳳祥、李開芳、吉文元率兵五萬，自揚州出發。三人都是廣西老兄弟，忠勇有餘，智謀不足，臨行又受洪楊「師行出道，疾趨燕都，毋貪攻城略地」的詔諭，北征軍的命運已經決定了。咸豐三年四月，破安徽鳳陽城，五月入河南，攻開封，六月，渡河攻懷慶。滿清集合北方軍隊死力防堵，吉文元戰死。七月，棄懷慶攻入山西，沿路血戰，餘衆不過二萬。楊秀清派兵二萬往援。九月北征軍入直隸攻至天津，清軍聯合團練開放河水，田野漫漫。十月，退靜海一帶。北征軍不慣北方冬季氣候，耳鼻凍裂，手足潰爛，糧食又缺，清軍四面圍攻，兵力大耗損。咸豐四年正月，北征軍放棄靜海，轉至阜城與清軍相持。五月，李開芳率一軍攻入山東高唐州，迎接南京新來援軍，林鳳祥困守直隸連鎮待援。四月，南京援軍在山東戰敗，林李分散不能會合，勢更孤弱。咸豐五年正月，林鳳祥軍糧盡，士兵餓極，不能舉刀矛，連鎮被清帥僧格林沁攻陷，全軍戰死，無一人投降。清軍全力合圍高唐州，李開芳軍兵精糧足，堅守不屈，四月，清兵決黃河水灌城，李開芳軍全軍淹沒。

北征軍勇敢堅決，血戰兩年，全部戰死，真不愧爲革命戰士，民族英雄，雖然戰敗，連會國藩也驚嘆它的「堅忍不屈」。北方大平原利於馬兵，地近北京，滿清統治比較鞏固，北征軍多是廣西湖南山鄉人不慣北方的氣候、地形、糧食，又不通北方的言語風俗習慣，再加宗教隔閡，難與民衆接近，這

些，都是北征軍的劣勢，戰敗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先在河南停頓一時，聯合河南、安徽、湖北、山東一帶總軍，既可掩護西征軍保守武漢，又可增加馬步實力，南京援軍也不會沿路被堵，北征勝利的希望還是很大，可惜被楊秀清的錯誤指導所斷送了。

西征——要確保南京，必需確保長江上游武漢、九江、安慶三大據點，關鍵尤在武漢的得失。太平軍與反革命湘軍長期戰爭，實際就是上游三大據點的爭奪戰，最後被反革命戰勝，武漢落入胡林翼手中，曾國藩得專力進攻九江、安慶，太平軍從此只能作防禦戰了。咸豐三年，與北征軍出發同時，南京派遣胡以晁、羅大綱、賴漢英、石祥貞、韋俊，進兵安徽江西，五月，克安慶、圍南昌。吉安等地民衆起義響應，聲勢大張。清軍危急，曾國藩在湖南被迫出湘勇數股來援，一戰潰敗，羅澤南股死傷最大。太平軍久攻南昌不下，退兵攻取九江，吉安等地民軍被湘勇羅澤南等擊滅。四年六月，攻克武昌。曾國藩湘軍水陸並進，會合其他清軍死力奪武漢，八月，陷武漢，經幾次大戰，太平軍退出湖北。湘軍圍九江，守將林啓容善於戰守，屢破湘軍，但形勢對湘軍有利。

西征軍得石達開指揮，在江西境大破湘軍，再度出兵攻武漢，五年正月，連克漢口、漢陽。曾國藩攻九江不下，湖北又告急，他是第一等重視上游的，分全部兵力爲四股，令頭等漢奸胡林翼、羅澤南各率陸軍一股，彭玉麟率長江水師一股援救武昌，留塔齊布五千人圍九江。二月，太平軍克武昌。這一次大戰是革命與反革命雙方決死的鬥爭，滿清政府與曾國藩湘軍密切合作，竭盡全力從失敗中求取勝利，太平軍方面却因領導集團內部不和從勝利轉成失敗，這裏必需敘述戰爭指導者楊秀清與軍事指揮者石達開的事跡，說明太平軍失敗是極可痛心的內訌產生必然的惡果。

咸豐三年，胡以晁攻開安慶，人民不習慣太平宗教與法制，頗多抗命。天王命達開赴安慶一帶

安民，達開既至安慶，以誠意相要結，擇村里之有聲望者爲鄉官，緝盜賊、嚴軍旅，使各安其業。更督民造糧冊，按畝輸錢米。於鄉里之豪暴者抑制之，無告者賑恤之。立權關於大星橋，徵江面商稅。軍用裕而百姓安之，頌聲大起」（太平天國野史）。這是最基本的建設，可是不滿三個月「東王楊秀清忌之，以燕王秦日綱代達開，命還京襄理朝政」。

等到咸豐四年七月，曾國藩湘軍大舉攻破岳州進攻武漢，才再派達開率兵往救。到蕪湖，湘軍已奪取武漢，入江西省攻九江了。達開守安慶，出兵援九江，大破曾國藩軍，又大破羅澤南軍。湘軍陸軍受挫，水師仍在江上猖獗，十二月，水師主力駛入鄱陽湖，達開築壘斷水師後路（湘軍水師因此分爲外江內湖兩部），命胡以晃羅大綱率小艇襲破曾營，奪得曾國藩座船，國藩駭極投水尋死，被附近小船撈起，倉皇逃入羅澤南營。這個漢奸頭子四月裏在靖港曾投水尋死一次，回到長沙整頓了一番湘軍，這一次又大敗尋死，確是悲觀失望到極點，在羅澤南營驚遺疏千餘字，準備再尋死。羅澤南竭力苦勸，說是「天若不亡本朝，此老必不死」，果然，他又幹起漢奸勾當了。達開乘勝進克武昌，六年攻南昌，湘軍撤九江圍兵，數萬人援南昌，達開兵才數千，自率敢死士夜襲樟樹鎮湘軍大營，湘軍最怕達開，不戰潰逃；達開率騎兵數十人猛追，湘軍全軍大奔不能止，曾國藩逃入南昌城困守。江西八府五十餘縣都入太平軍手中。

咸豐五年正月，石達開進攻武漢，二月，克武昌，曾國藩深知「論東南大勢，以武昌據金陵上游，爲必爭之地，宜厚集兵力，爲恢復之計」（與胡林翼書）出四分之三兵力與西征軍爭武漢，江西湖北兩省大戰開始，湘軍敗多勝少，大將羅澤南塔齊布相繼斃命，曾國藩在南昌危城中，內外隔絕，「凡江楚文報自賊中經過，輒被殺害，臣等屢募長髮探率，臘丸細字，作爲隱語，以通消息」（五月陳

明鄰省援兵協餉片)。他驚駭到「道途夢梗，呼救無從，中宵念此，魂魄屢驚」，已成癡中癡的形勢。他是被當時漢奸羣奉爲唯一領袖的，羅澤南所謂「但留曾公一人在，其他均不足計」的，南昌如果攻下，國藩就擒，等於滿清政府和漢奸羣失去靈魂。正在兩軍肉搏最緊張的時候，七月，楊韋內訌勃發，石達開聞變，急自湖北洪山馳回南京，被洪秀全解除兵權。達開畏禍率部自由行動，從此太平天國轉入衰亡階段，無力再爭上游，十一月，湘軍攻陷武昌，大舉進攻九江城。

石達開是會國藩最怕的敵人，說「逆首石達開，狡悍爲諸賊之冠」(咸豐八年陳明石逆情形片)。咸豐帝聽說楊韋內訌，喜歡得大發幻想，命會國藩準備達開來降，說「倘向會國藩乞降，應如何處置法，或使先自立功贖罪，再邀重賞，亦當預爲籌畫」(十月二十日上諭)。反革命對他畏懼重視如此，洪秀全却自壞長城，迫他逃出南京。北征軍因孤軍失援，放走了咸豐帝，西征軍又因內部衝突，放走了會國藩，兩次失機，革命頹勢很難挽救了。

東征——江南北兩大營威脅南京，太平軍留大部分精銳守城，兵力不能出鎮江以東。江浙地方富庶，從財源上，正如會國藩所稱「克一城有一城之利，拓一里取一里之財，究竟遠勝於他省」(同治元年近日軍情片)，從軍事說，南北大營招募兵丁費，北京政府官員旗人生活費，主要依靠江浙上海三處供給，正如胡林翼所說，「江浙爲倉庾根本，京師性命所系」。東征江浙，正是破壞南北大營援助北征軍、削弱北京政府的必要處置，洪楊在這方面完全不加考慮，是最大失策之一。

太平軍攻克南京，人們都預料上海一定是攻擊的目標，英領事組織義勇團保護租界，清官吏要求各國干涉，保護上海城，被各國拒絕，束手無策。當時上海有廣東人八萬，福建人五萬，都同情太平軍，準備起義響應。咸豐三年九月，廣東乙首黨(天地會的一派)首領劉麗川聯合福建青巾黨首領陳

亞林及江西編餉會共二千餘人，從北門攻入知縣衙門，佔領上海城。這次起義止殺死一個知縣官，傷一個北門守門人，秩序非常良好。粵閩贛同鄉及上海人寧波人整千的加入，勢力大增。他們用「大明太平天國」名義出佈告，一律蓄長髮，但不奉上帝教。他們在美國教士家中發現馮雲山的幼子，立即歡迎入城，花五百銀元買一匹好馬讓他騎上，在城內遊街，很熱鬧高興，這就是天地會對太平天國的態度。他們派代表到南京接洽，洪楊認他首黨是天地會的支派，有「腐敗之習慣，放恣之性癖」，拒絕合作。起義軍與清軍三萬人交戰，不怕大炮轟城。也不怕開地道進攻，屢次殺敗清軍，不少清軍自動降到起義軍方面來。咸豐四年十二月，法國水師提督及領事聯合清軍攻城，法艦發砲擊毀東北角城牆，法軍二百五十人率大隊清軍登城，起義軍奮勇抵抗，殺死法軍十三人，擊傷五六十人，清軍死一千二百人，傷一千人。法軍逃走，清軍還留在城上，上海幫首領小鏡子（即潘可祥）率一二百人以上城搗門，全隊大聲呼喊。「清軍聞聲，心驚胆震，急忙奔逃，出城門也來不及了，即從城上墜下，其時天寒冰結，清軍許多跌死城下，有些跌在長矛之上，有些斷腿折骨，傷者皆被拾回清營。清軍既逃回本營，黨人復關閉城門」（雅芝教士太平軍紀事）。清軍得租界援助，圍困上海城十七個月，咸豐五年五月，起義軍糧食斷絕，終於放棄縣城，突圍逃走。如果太平軍不因宗教偏見，派兵援救起義軍，確實佔領上海，外交上（當時英美聲稱守中立）財政上都有極大的便宜，滿清後來也不能組織淮軍常勝軍，戰局可能發生另一面貌。

清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戰勝上海起義軍，五年正月，進攻鎮江，江南大營向榮加緊圍困南京，太平天國形勢危急。楊秀清派遣李秀成、陳玉成等四丞相救鎮江，大破江蘇軍，殺吉爾杭阿。六年三月，秀成渡江擊破江北大營。秀清又命李秀成、陳玉成等，攻向榮大營，五月，李、陳軍從西面，鎮江軍

從東面夾攻，恰巧石達開率兵來援，三面奮擊，大破向軍。張國樑扶向榮（七月向榮死，和春代爲欽差大臣）突圍逃往丹陽。三四年來圍困南京的江南大營，一戰瓦解，楊秀清見外敵已去，開始在南京發動內亂。

軍事是革命的骨幹，太平軍將領和士兵都是勇敢堅決的革命戰士，可是在錯誤指導下，雖然戰爭中獲得不少勝利，到底不能得到應得的果實，革命發展陷於停滯了。

外交問題

上海是英美法三國侵略中國的根據地，它們不願中國有新的變動，尤其不願上海有新變動。咸豐三年四月，英公使卜亨給太平天國信裏說「總之中國既准五口通商，則無論何人，有損我商務者，我國惟以兵戎從事」，這就是各國對太平天國的一般態度。

當時滿清政府大施卑污賣國手段，要求外國援助。一面宣稱租界西人都贊成清政府，歐洲兵船十餘艘，準備協助剿匪，進攻南京，一面劃上海內外城廂地，請各國海軍保護。各國拒絕不允。清政府技窮，乃偽造太平軍排外告示，威嚇外人。英香港總督邦漢親到南京訪問太平首領，天王接見邦漢，自稱爲教主，稱英國爲藩屬，英王爲藩臣，邦漢很不愉快的回去，滿清卑污手段算是成功了。

太平天國方面，不懂得國際情勢與外交手腕，一時錯用民族自尊心，那是不足怪的。外國侵略者反對太平天國，主要不在洪秀全的傲慢態度，而在他的正確主張，就是國際地位平等，（中外是兄弟之國，要共同生活如弟兄），貿易完全自由，但嚴禁鴉片輸入。其次是「將來外國人可以隨便用汽船鐵路電線及其他西洋機器而無礙」（太平軍紀事）。當時侵略者自稱「文明傳播者」，把中國人當作野蠻人對待，而國際貿易情況，舉一八五五年爲例，上海輸入總額達一百六十萬鎊（現金和鴉片不在內

），其中英國佔一百一十二萬鎊，美國佔二十七萬鎊，其他國家佔二十萬鎊，上海輸出總額則達一千二百六十萬鎊，其中英國佔六百四十萬鎊，美國佔五百三十九萬鎊，其他國家佔十萬鎊。這樣巨大的輸出超額，完全靠鴉片輸入來抵補，一八五六年，輸入中國的鴉片約值三千五百萬元，英、印政府在這一年的收入二千五百萬元，佔國家收入總額的六分之一（一八五三年佔七分之一）。嚴禁鴉片，等於致英、印政府於死命，這是英國爲首的侵略者反對天國的基本原因。其次，天國允許將來外國人可在中國辦新式交通和工業，那時候資本主義還沒有到帝國主義階段，不能向國外輸出資本，事實上等於天國有在將來自辦新式交通和工業的意志。英國會議員斯卜萊登對選舉人演說「假使中國成爲一個大工業國，那我就不知道，歐洲從事工業的居民如果不將自己降到自己競爭人的地位，如何能够經受得住和這些競爭人的鬥爭」（資本論引）。他們深怕「世界上生活程度最低的中國人」進步到資本主義社會，這是反對天國的第二個原因。所以英美法雖然宣佈局外中立，是對蓬勃發展的太平革命勢力有所顧忌，並非善意的真正中立。太平天國考慮禁烟問題，不願引起外國衝突，採取消極政策，停止向江浙作軍事行動（賴文光「供辭」說明這種政策確是畏避外國侵略者）。其實乘革命漲潮，奪取上海，與英國訂約逐年減少鴉片輸入量，英國爲保持絲茶貿易（產地在天國境）及發展布匹貿易（英國特產），衝突不是不可以避免的。

政治思想與宗教問題

洪秀全倡導的太平革命運動，是中國廣大窮苦人民反官紳地主富商高利貸一切封建剝削制度的產物，同時它又是英國大砲的產物，這就是說，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與世界的資本主義發展有機地聯繫着。秀全生長在國際市場的廣東，通過基督教接受了某些資本主義思想影響，與人民反封建剝削的

實踐要求結合起來，再加上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與周禮制度，形成一套特殊的上帝教義，其中包含着民主內容，主觀上有共產主義的空想，客觀上正是資本主義發展要求的反映。它以平等自由爲主旨，創造新宗教，再由宗教發動武力，借武力攻下反動的堡壘。

宗 教

洪秀全的上帝是平等自由博愛的上帝，（楊韋內訂以後，上帝變樣了）是戰鬥誅妖的上帝，總之是一個革命的上帝。恩格斯說：「一切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在當時（歐洲資產階級開始革命時代）都要帶上宗教的外衣，而且首先必然要反對教會」（天主教會）。上帝教正是這樣的宗教，它不要在中國有六七千教徒的天主教做朋友，却要在一千四百教徒的基督教做兄弟，這不是偶然的。中國沒有歐洲那樣權力集中的天主教會，而有散漫繁雜的菩薩、神仙、孔子、儒先以及無數牛鬼蛇神，替封建統治者服務。洪秀全把「正」的方面集中出一個「皇上帝」，「邪」的方面集中出一個「闍羅妖」，鬥爭營壘劃分得很清楚。他開始傳教，一個地方紳士勸說「中國人皆拜偶像的，讓他們自由拜神罷」，這個統治階級的所謂「自由」，被他拒絕了，他把自己書塾裏的孔子牌位拋棄，又打毀威風極大的甘王爺神像，上帝教徒受他的感化，從舊神權中解放出來，敢於向人間社會要求信仰自由。當桂平縣官吏派兵捉拿洪秀全馮雲山時，教徒大呼「我們要拜什麼神，是不能受人號令的」（太平軍紀事），金田起義後，清兵屠殺新墟，教徒直立受刑不肯下跪，對清兵大呼「爲何遲遲不動手，要殺便殺罷，我是不怕死的」（太平天國起義記），這是多麼英勇的戰鬥精神呵！

救世、醒世、覺世三篇是上帝教根本教義，要求在上帝統率下，國與國平等，人與人平等，男與女平等，富與貧平等，反對私，反對妖，反對不正，反對壓迫，充滿着對闍羅妖戰鬥的勇氣。此後天

國制度都從三篇教義出發，成爲太平革命運動的最高原則。

上帝教包含宗教迷信與革命思想兩部分，在廣西，迷信部分會起了極大的組織作用，但從全國範圍說來，一般人保守拜鬼神尤其拜祖先的習慣，不能輕易放棄，外國耶穌更不合鴉片戰後全國反侵略的心理。太平軍入湖南境，如果參照萬大洪告示的方法，強調反滿革命理論，少提天父天兄耶穌一類迷信，號召力定會增大無數倍。可是太平軍不懂得一出廣西，宗教部分必需放鬆的道理，自湖南到南京途中用東王西王名義，發布「奉天討胡」、「奉天誅妖」、「論救世人」三道檄文，後兩道勸人丟邪神，拜上帝，信奉上帝教，前一道申明民族大義，鼓舞革命義憤，文字極強健有力，但至少被前兩道折扣一半。據比較可信的傳說，當太平軍圍長沙時，左宗棠會去見洪秀全，論攻守建國的策略，勸放棄天主耶穌，專崇儒教，秀全不聽，宗棠夜間逃走。不論左宗棠果有其事與否，反滿不反孔，確代表一部分士人的思想，這種人既不像官僚那樣腐朽無能，又有能力去欺騙落後民衆，是當時一種不可輕視的力量。會國藩「討粵匪檄」特別強調「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又說「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所過州縣，先毀廟宇，卽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污其宮室，殘其身首」。這一宣傳，會國藩勝利了。湘軍的領導骨幹是士人，借「衛道」名義掩護漢奸的實質，如果太平軍對士人有正確政策，可以削弱湘軍的一部分實力。

太平軍出廣西境，落後的人民對完全陌生的上帝教，自然會看作外國教，接受會國藩「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的惡宣傳。太平軍在信仰方面，應改「打倒一切偶像」爲「打倒菩薩、神仙、淫祠」，不必毀孔子關岳廟，更不必強迫人民專拜上帝，理論方面應發展儒書中

進步學說（救世醒世兩篇就是這樣做的），與平等思想結合，不必把儒經當作「妖書」。這是革命的讓步，也是對反革命的進攻，止有這樣，才能減輕社會的阻力，打擊曾國藩一類人的陰謀。但後來洪楊愈更偏重發展迷信部分，尤其是楊秀清假借「天父下凡」，遂行私意，僭妄自大，造成「宗教腐化」（太平軍紀事評語）及洪楊衝突的惡果，發動革命的工具轉化為破壞革命的毒索，宗教這個火不是好玩的呵。

私有財產

咸豐三年，太平天國在南京刊布「天朝田畝制度」，這是天國政治經濟的基本思想。文件中有下列一段話：

凡天下田，男女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能暖也。」

根據這個廢除私有財產的原則，在土地問題上產生分田法，根本推翻地主佔有土地制。

分田云者，凡田分九等，其田一畝早晚二季可出一千二百斤爲上上田，可出一千一百斤爲上中田，以下遞減至四百斤則爲下下田。上上田一畝，當下下田三畝。各按家口之多寡，（不論男女）以行分田，凡男婦每一人自十六歲以上，受田多踰十五歲以下者一半。如十六歲以上分上上田一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半，分上上田五分。一家六人，則分三人好田，分三人醜田，好醜各半。

這個分田法規定得如此詳盡細密，就不得不陷於空想，據現有各種史料看來，它似乎未曾實行過。不會實行的原因，首先是土地與人口的配合，情形非常複雜，不像思想那樣容易，其次是滿清

軍隊不斷進攻，燒殺搶掠，天國領土常起變動，農村秩序無法安定。但從另一意義看，也可以說實行了，因為地主高利貸者或死或逃，土地歸耕者所有，地主剝削已不存在，滿清地方政權摧毀，會國藩「備陳民間疾苦疏」所舉三條也不存在，農民有田可耕，無各種剝削，僅對天國政權繳納輕微的糧米（令利太平天國外紀說：賦稅極輕，農田視土地之肥瘠，分九等課稅）。照會國藩（同治二年）說：「民間耕種，與賊各分其半」，照楊秀清奏：「曉諭良民，照舊交糧納稅」，照李秀成自述：「蘇州百姓應納糧稅並未收足，田畝亦是聽其造納，並不深追」，照林彩新勸諭青岩民衆檄文（同治元年）：「照依舊規，請令設局，投誠捐糧」依據這些材料，太平軍取之於民的主要是米糧，銀錢非急需，並不徵收地丁。（現存浙江仁和縣，太平十三年便民由單可證）所謂照舊捐糧，如果照滿清漕米舊規（據會國藩所說），「錢糧之重甲於天下」的江南田，每畝正額不過二斗內外，即使加上「漕斛」、「幫費」，總數也不過六斗。佔每畝產量（一石六斗至二石）中三分之一左右（滿清錢糧太重，不在額數而在米變錢，錢變銀及其他折色、浮收、訛詐、刑追等惡弊），並非「公私各半」。天國農民生活與滿清統治時期對照，顯然有天淵之別，這就給「最純粹的、最徹底的、完滿到合於理想的資本主義」造成最迅速發展的先決條件，太平革命的偉大成就在此，會國藩爲首的一羣賊匪「痛恨」的理由也在此。

在廢除私有財產制（實際上只是要求廢除封建私有財產）原則下，又產生聖庫（藏銀錢）、聖糧（藏米糧）制度。太平軍上起天王，下至士兵，都不領俸錢，止是食肉有區別，天王每日給肉十斤，以次遞減，至總制（等於滿清知府官）每日半斤，總制以下不給肉。每逢禮拜日，各官開單赴聖庫聖糧領禮拜錢、糧、米、油、鹽及祭上帝物品。兩司馬（管轄二十五人的小軍官）每人每七日給錢一百

文，普通兵士五十文。每二十五人每七日給米二百斤，油鹽各七斤。另外有買菜錢，下級軍官可向上級請求，錢數不等，買豬鷄等供衆兵會餐。原則上天王到士兵不准私蓄財產，衣食器物一切生活費用（包括醫藥、殘廢院、老人館）全由公家供給，實際是個別高級領導者積蓄不少私物，極大多數官員及士兵始終保持嚴格紀律，表現高度的革命純潔性。例如維多利亞主教稱太平軍紀律「較清教徒尤爲嚴正」，反對太平天國的卜羅斯在致魯塞爾信裏，不能不承認「寧波已爲亂軍所據，城內尙無殺戮之事，生命財產之損失極少，亂軍秩序奇嚴」這個事實。

在廢除私有財產制度原則下，又產生近於工業國有的諸匠營制度。太平軍領土內，集中各種工人，按技術分別設立諸匠營。照「賊情彙纂」所載，有木匠，金匠，織匠，金靴，繡錦，鐫刻等營，這種匠營止管生產物品，不兼管收發。又有各種典官，如典紅粉，主製造火藥；典硝，主煎熬硝磺；典鐵，主製造兵器鐵器；典銅，主製造銅器。典官製造兼收發，與諸營匠同爲管理生產的機關。這個制度已近於手工工場性質，比手工業提高一步。據「賊情彙纂」的批評，稱爲「各儲其材，各利其器，凡有所需，無不如意」，足見生產效率是優良的，如果繼續前進，可以順利地轉到機器工業階段。

廢除私有財產的理想，在實行時表現爲摧毀地主階級，耕者有其田官員兵士生活共產化，工業國營三種形式，基本上是成功的。後面兩種所以成功，由於前一種的成功，前一種所以成功，由於太平軍領導者的實際行動不是硬照教義的空想，而是照顧到農民商人（主要是農民）的客觀要求。天朝田畝制度規定：

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穀外，餘則歸國庫。凡麥豆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蓋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

主有所運用，處處平均，人人飽暖矣。

張錫庚「難民陳述賊情記」載下列詞句與太平軍告示。「天下農民米穀、商賈資本，皆天父所有，全應解歸聖庫，大口歲給一石，小口歲給五斗」，語意符合。

不要錢漕，但百姓之田，終年所得粒米全行歸天王收去。每年每大口給米一石，小口減半，以作養身。舖店本利，亦歸天王，不許百姓使用。

這自然是不能實行的辦法，定都南京不久，修改政策，對農民採取徵收漕米，對商人採取自由貿易，天國軍事政治才獲得經濟基礎，農村因之組織起來，金融因之活動起來。

天國領土內採取古代寓兵於農的組織法，普遍建立守土鄉官制。鄉官編制與軍隊同，平時管理民政（徵糧、工程、教育、辭訟、保舉），有事每家出一人當兵，即成鄉軍，鄉官即成軍官。編制法全照周禮，就是五家爲伍，設伍長一人；五伍爲兩，設兩司馬一人；四兩爲率，設率長一人；五率爲旅，設旅帥一人；五旅爲師，設師帥一人；五師爲軍，設軍帥一人。每鄉共一萬二千五百家，成軍得一萬三千一百五十五人。軍帥以下各鄉官，全由人民公舉，「凡天下每歲一舉，以補諸官之缺」。「凡天下諸官，三歲一陞貶，以示天朝之公」（天朝田畝制度）。這雖然止是有限的民主權利，但在統治階級看來，已是恐慌失色，「賊情彙纂」說「賊之牢籠人士，聯絡方域，計畫無倫於此者」。換句話說，就是專制統治最怕民主政治。天國人民已經獲得初步的選舉鄉官權、地方自治權，不僅從古所無，直到今天將近百年，雖然陝甘寧邊區及敵後解放區已經實行了比這完備多倍的民主政治，但許多地方，人民還不會取回這些權利。

太平軍對國幣、國內貿易，採取自由政策，抽稅極輕。「以船長一丈，抽稅千錢，所載之貨，分

細網貨，粗貨船長一丈，抽稅錢二千，細貨倍之。大率以鹽布棉花煤米爲粗貨，絲綢蘇貨爲細貨。抽稅之後，給以船票一張，如遇他軍，可以驗票放行，無票則沒收之。」（太平天國野史）太平天國外紀比較滿清與天國兩方商務，得出如下的觀感：

余自仙女廟（江蘇江都縣署）購米後，回南京，途中遇釐卡甚多。每二三里即有一所，草屋上懸抽釐助餉字樣。自仙女廟至瓜州（南京對岸儀徵縣屬）釐卡二十處，所定之稅，視法定額增加數倍，任意剝削，小民控訴無門。

太平軍於各處所設之稅局，其組織極公平正確而簡單。每鎮每村僅一所（大概是指鄉官所管國庫），貨物已納稅者，給與憑照，不再於他處科斂。絲業之所以發達，未始不由於稅法之良善也。歐人之至南京貿易者皆能言之。

太平天國稅法良好，境內平安（一八六〇年，容闈帶現銀四萬兩，在天國太平縣買茶葉二十八船回上海），農民購買力增強，自然促進商業的發展。英教士洛勃斯克給香港日報通信說「南京城外，商務發達，秩序安謐，城內居民則衣食豐足，安居樂業」。這種繁榮情況，外國商人應該也是歡迎的，事實却相反，因爲他們是侵略者，愈引起對天國的憎惡，試看下列輸出入表。

絲茶輸出（茶單位十萬磅）（絲單位千包）

茶 絲

上 海 福 州

110

一八五一年
一八五二年

六〇〇

賊首用旗招往過船相見，云，如有大砲火藥米糧可來銷售。英夷告以此等貨物如賣與徐等，有違中國和好，如要烟土，儘有可賣。答云，我處不用此物。」英國侵略者開始就憎惡太平軍，因為它是鴉片的仇敵。滿清政府取向反的方向，一面儘量歡迎鴉片，一面向侵略者搖尾求援。例如咸豐三年署兩江總督楊文定致英美兩國公使照會說：

爲借船助剿以安商民而全永好事：竊賊匪據船東下，連陷江寧鎮江……欽差大臣向榮亦以須借貴國火輪兵船爲望……希念兩國通商合好已久，今商民被擾，貿易不通，且賊匪烟禁甚嚴，一遇我國吸烟之人，無不被殺。統希速發火輪兵船，來江剿擊，本署部堂欲爲商民除害，斷不大言欺人。倘蒙允發火輪兵船前來洗蕩賊匪，必當奏明皇上，加重酬勞，而貴國借兵恤鄰之聲名，亦永傳不朽矣。

楊文定無恥到借太平軍嚴禁鴉片作爲理由來恐嚇，利誘英美，充分暴露出統治階級的卑污賣國心理。曾國藩以及後來的那些獨夫民賊，思想上完全是楊文定的繼續。

太平天國在土地政策上的成就，使外國侵略者與封建統治者由恐慌而聯合。太平軍因領導集團內訌，使反革命有機會來摧毀這個成就，中國社會從此停滯了一百年。

婦女與婚姻

太平軍根據平等自由的原則，作了偉大的婦女解放運動。恩格斯說「在每一社會中，婦女解放底程度，是一般解放底天然尺度。傅立葉是說出這一思想的第一人。」我們可以說，太平軍是實行這一思想的第一人。太平軍看婦女是姊妹而不是奴隸，因此與看作兄弟的男子一切平等。在婚姻上，「凡天下婚姻不論財」（天朝田畝制度）。在經濟上「各按家口之多寡以行分田，不論男女」（同上）。在

政治地位上，女官與男官同等，最高官級是女軍師正副又正副四人（揚秀清男正軍師），開科取士，男女間有應試權。在軍事上，有女軍四十軍（每軍二千五百人），「男將女將盡持刀，同心放胆同殺妖」（永安城突圍詔）。在生產上，設立女館，學習工藝。在軍律上「凡強姦經婦人喊冤，定即斬首示衆，婦女釋放。如係和姦，男女皆斬。」其他如禁纏足，禁買賣奴婢，禁娼妓，禁人民蓄妾，所有惡俗，悉數剷除，這樣澈底的婦女解放運動，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前，世界歷史上不會有第二個，真是人類最光榮最先進的行動。曾國藩號召「扶持名教教敍人倫」（討粵匪檄），就是要驅迫婦女回到奴隸圈裏去生活。

婦女解放運動改變了婦女的卑弱姿態，英人吳士禮在「太平天國天京觀察記。」裏說「此處（南京）與全國吾所會遊之其他城市大異之點，即是婦女隨便遊行或乘馬於通衢大道，而又絕不裝模做樣害怕外國人如其他中國婦女所常爲者，亦不迴避我們。」從纏足羞怯到大街騎馬，不避男人，無疑是解放運動的效果，吳士禮却譏諷爲太平軍據掠美女供淫亂，侵略者仇視進步，本無足怪。可惜太平軍領導集團中人多數納妾，洪楊尤縱慾傷化。吳士禮說「他們每藉神聖下凡的啓示以爲作惡行淫的護符，甚且藉以廢除第十誡」，這是事實，楊韋二人爭奪美色，竟成爲內訌的原因之一，不免給解放運動留下一個污點。

太平天國在政治經濟方面一般是成功的，外交方面避免衝突，取得英美法形式上的中立，還不算大失策，軍事方面戰略指導錯誤，失去搗毀滿清中央政權的機會，雖然石達開在上游仍能保持進攻形勢，擴大革命領土，但已屬保護南京性質，無力窺取北京了。從全局說來，定都南京到楊韋內訌是革命停滯時期。

三 太平革命衰敗時期

——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

本時期可分前後兩期。前期從一八五六年楊韋內訌至一八六一年——咸豐十一年八月安慶失守，革命勢力處在防禦地位，會國藩逐步進逼，戰爭爲了打破合圍形勢。後期從安慶失守至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六月南京陷落，革命勢力處在被圍困地位，反革命合圍成功，戰爭爲了解圍，自然解圍是不可能的，太平革命終於失敗了。

前期革命形勢——防禦

永安封玉以後，楊秀清專擅領導權，洪秀全退居閒散，這是不正常的現象。向榮「迭次詢訪難民口述賊情片」裏說「臣等於抵金陵後，每見城中逃出難民必詳加訪問，僉稱洪秀全實無其人，聞已於湖南爲官兵擊斃，或云病死，現在刻一木偶，飾以衣冠，密置僞天王府內，楊逆七日一朝，其餘受僞職者皆不能見。」雖說是論傳，洪秀全止是名義上領袖，可以想見。秀清上逼秀全，下壓韋石，彼此猜忌怨恨，繼續增長。咸豐六年七八月間，向榮已敗逃，南京城圍暫解，秀清「逼天王親到東王府封其萬歲。」他選擇這個時機，顯然顧慮到內亂並鎮壓內亂，免外敵乘機攻城。北翼二王也密謀「殺東

王一人，殺其兄弟三人，除此以外俱不得多殺」（李秀成自述）。韋昌輝是豪紳地主富商出身，野心極大，自成一箇次於楊黨的所謂韋黨。秀全密令昌輝圍揚，昌輝從江西急速入京，殺秀清及楊黨（當然不全是秀清私人）數千人。達開在湖北洪山，「知道京城殺害許多人，狼狽趕回，計及免殺之事。不意北王頓起他心，又要將翼王殺害。翼王走上安省。北王將翼王全家殺了，不分清白，亂殺文武大小男女，勢逼太重。各衆內外，並合朝同心，將北王殺之，人心乃定。後翼王回京，合朝同舉翼王提理政務，衆人歡悅。主有不樂之心，專用安（洪仁發）福（洪仁達）兩王。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歡悅。此人又無才情，又無算計，一味固執，認實天情，與我天王一般之意見不差，壓制翼王。逼翼王他逃。」這是李秀成所說當時實情，最爲可信，從這裏可知大量革命戰士在楊黨，韋黨罪名下被冤殺，損失是不可數計的。洪秀全違反衆意，逼走石達開，他是唯一勝利收拾人心重振危局的人物，如果天王親理朝政，任達開爲輔佐，局面可能比秀清專政時期好轉，秀全這一謬誤處置，損失也是不可補償的。達開走後，秀全依然過着腐化生活，隱居深宮，朝政委託衆人厭惡的蒙得恩（雙臣）、洪仁發、洪仁達（二洪是天王胞兄）三人掌管，後來又加入洪仁政、洪仁玕（二洪是天王堂兄弟）二人。這些人都是貪鄙齷齪專做惡事的破壞者，弄得「人心敗壞，政事不一，各有一心，各有散意」（李秀成自述），不是李秀成、陳玉成爲首的革命力量在戰場上支持，天國早就覆亡了。太平軍一壞於楊秀清的專擅跋扈，再壞於韋昌輝的瘋狂屠殺，最後壞於洪秀全的任用私人，尤其是最後一壞，歷時較久，禍國的軍令政令迫使太平軍逐步削弱以至潰滅。

石達開是個人英雄主義者。洪氏集團和他決裂，並不等於太平軍和他決裂，不該脫離革命營壘，獨立行動，企圖自己創業。他的錯誤行動，終於覆軍喪身，太平軍也勢孤敗滅，個人英雄主義害了他。

又害了太平軍。

章昌輝殺達開一家人。達開在安慶調湖北洪山軍到安徽寧國，準備報仇。秀全借東楊餘黨力殺昌輝，召達開入京，用「留京輔弼」名義，解除達開兵權。東楊餘黨謀大殺章黨，幸得陳玉成反對，說「太平軍皆東北二王舊部，如欲株連，非殺盡太平軍不可。」但楊章兩黨結成深仇，人人自危。當時守武昌城主將正是昌輝的兄弟章俊，他是太平軍驍將之一，如果城外洪山援軍不撤退，楊章餘黨不互仇，武昌可以堅守不失。洪氏集團既不派遣新援軍，又不安慰守城軍心。十一月，章俊因糧盡退出武昌。（咸豐九年，章俊投降湘軍），太平軍從此喪失上游重鎮，無力再圖恢復。達開受洪氏排斥，危疑不安，又感到大勢已去，南京難保，咸豐七年五月，約集將士十餘萬人往安慶，與太平軍分裂自成一軍。

正當太平軍內部分裂的時候，反革命陣營也引起了頗深的裂痕。原來咸豐帝並不信任這個漢奸頭子——曾國藩，相反，對他和他的湘軍懷着極大的猜忌心。咸豐帝聽到楊章內訌，非常快意，十月二十日上諭作出兩種估計，一是「該逆（石達開）於諸賊之中，最爲兇悍，若令回竄江西，佔踞數郡，煽惑羣民，其勢愈難收拾」，一是「該逆倘向曾國藩處乞降，應如何處置之法，或使先自立功贖罪，勞再邀重賞」，他着重第二估計，怕曾國藩貪功殺降，預先把它指出。對曾國藩却加以「徒事遷延，勞師糜餉，日久無功，朕即不遽加該侍郎等以貽誤之罪，該侍郎等何顏對江西士民耶」的訓斥，準備成功以後，免得曾國藩及湘軍將領恃功要挾。咸豐帝一貫採取這樣的態度，從來不給他軍、政實權。曾國藩在歷陳辦事艱難仍懇終制摺（咸豐七年六月）裏訴苦說「臣未奉有統兵之旨，歷年在外，不敢奏調滿漢各營官兵，雖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權反不如提鎮。」又說「臣辦理軍務，處處與地方官相交

涉，文武僚屬，大率視臣爲客，視本管上司爲主，賓主既已歧視，呼應斷難靈通。」這些「艱難」還不算，再加上中央政權的「部」和他作難。他說：「部頒緊要之件，亦不徑交臣營，四年所請部照，因久稽而重請，六年所請實官執照，至今尙無交到確耗。此外文員之憑，武官之劄，皆由督撫轉交，臣營常遲久而不到。」部不承認他是正式統兵大員，因爲他「未奉有統兵之旨」，咸豐帝連差遣他作軍事行動，總是避免「明降諭旨」，止用「廷寄」（軍機大臣轉達）的形式。會國藩受盡了皇帝、部、地方官的明氣，還要受各方面的暗氣，他說「外間時有譏議，或謂臣係自請出征，不應支領官餉；或謂臣未奉明詔，不應稱欽差字樣；或謂臣曾經革職，不應專摺奏事。迄今歲月太久，國防之更換太多，往往疑爲偽造，釀成事端」。但是會國藩堅決做反革命，不論遭受多少明氣暗氣，總抱定「低首茹歎，但求集事，雖被侮辱而不辭」。他上了這個訴苦奏摺，原想滿洲主子給他一些實權，不料咸豐帝毫不體恤，竟奪去他的湘軍統率權，下諭「准其開去兵部侍郎之缺，暫行在籍守制」。會國藩大出意外，再上一個奏摺表示「軍勢未定，寸心難安」。咸豐又給他殊批說「江西軍務漸有起色，卽楚南亦就肅清，汝可暫守禮廬，仍應候旨。」這說明咸豐帝猜忌會國藩不亞於洪天王疑忌石翼王，部和地方官侮辱會國藩，超過洪氏集團壓抑石翼王，湘軍擁護會國藩，不及太平軍悅服石翼王，會國藩處境實際上不比石翼王好些。反革命內部矛盾與革命內部矛盾互爲因果，如果翼王能善處逆境，忍受挫辱，竭力保持內部和平，必然等到反革命矛盾擴大，湘軍被綠營兵壓倒的機會。會國藩在家閑住一年，因石軍攻入浙江省常山開化，援浙湘軍將領不服調遣，咸豐帝恐慌，給他辦理浙江軍務名義，去「挽救東南大局」。他「奉命卽行」，又掌握了湘軍統率權，而石翼王却成爲無根基的孤軍了。

石達開率大軍到安慶，轉入江西，攻取許多郡縣。當時情形是「擊獲賊中僞文，均稱石達開諭令

諸賊謹守江西。凡江西境內之賊概未調赴下游，而下游之賊反由景德鎮以赴婺源（徽州）建（建昌）。蓋安慶爲石逆舊踞之巢穴，江西爲石逆新陷之土地。論旨所謂石逆糾合黨羽，自圖占踞，已可概見」（咸豐六年十一月江西近日軍情據實覆奏摺）。照會國藩的估計是「以大局言之，北岸安慶，南岸九江，該逆之所必爭也，以江西言之，瑞州臨江爲根本，撫州吉安爲膏腴，亦該逆之所不肯輕棄也。」如果達開真像會國藩所料那樣做，據安徽江西兩省，與陳玉成李秀成遙相應援，夾擊湘軍，不僅九江安慶可以堅守，陳玉成不會失援敗死，楊韋餘黨投降清軍可能減少，而且那時候捻軍已與太平軍合作，戰爭擴展到中原地區，革命反革命的決鬥，勝敗還是未可知的。石達開不願皖贛有民衆擁護的有利條件，却決心遠征四川，自立一國。路線錯了，雖然擁數十萬大軍，轉戰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廣西、廣東、貴州、湖北、四川九省，歷時七年，表現革命軍隊的高度堅韌性，到底不免一敗塗地（同治二年在四川大渡河戰死）。狡猾的會國藩，看出達開已不是大敵，咸豐九年，定四路進兵策，一意取安慶、南京，把達開軍當作「流賊」，放到第二等地位上去。

石達開走錯了路，太平革命重担不得不在李秀成、陳玉成二人肩上。陳李都是天才的軍事家，陳保衛安慶，縱橫上游皖鄂兩省，與會國藩湘軍、胡林翼楚軍、勝保北軍相持數年，會胡竭全力抵抗，饒倖獲勝，陳敗安慶失陷。李保衛南京，克復下游江浙兩省，與會國藩湘軍、左宗棠湘軍、李鴻章淮軍、戈登常勝軍、英法侵略軍力戰數年，勝敗略等，李敗南京不守。陳李失敗，主要由於洪氏集團從中破壞與石達開不願配合作戰，第二原因才是外國侵略者直接幫助滿清，共同鎮壓太平軍。

本期戰爭以陳玉成安慶保衛戰爲主，李秀成東征軍爲輔，戰爭目的在打破反革命軍進攻南京。

陳李聯合作戰

楊韋兩黨互殺，再加石達開帶走將士十餘萬人，太平軍實力大損耗。陳玉成勇猛有戰功，又是洪仁玕的姪婿，李秀成新招張洛行隴得樹所部捻軍，號稱五十萬，兵力最大，洪秀全不得不依靠陳李來支持局面，但並不真心信任。

咸豐七年九月，和春張國樑陷鎮江。八年三月，和張進至雨花台，又建立江南大營，與德興阿的江北大營隔江呼應，掘長溝，圍南京城。四月，九江被湘軍李續賓部攻陷，守將林啓容全軍一萬七千餘人戰死，無一人求降。這時候南京安徽同時危急，天王下詔在外將領勤王，沒有人奉詔來救。天王止得封秀成爲忠王（玉成先封英王），都督中外諸軍。秀成威信極高，親到安徽濉陽鎮（桐城縣東南）大會各鎮將領百餘人，慷慨誓師，諸將都願服從指揮，太平軍重新團結起來。在樞陽大會上定計先破江北大營，通南京糧道。八月，秀成聯合玉成前後夾擊，大破德興阿勝保馬步軍，殺萬餘人，又大破張國樑援軍，江北大營潰散，南京與江北的交通恢復。李續賓得九江，乘勝進攻安徽，連陷太湖、潛山、石牌、桐城等地，九月，攻三河鎮。陳玉成率兵往救，李秀成援軍繼進，大破續賓軍。李續賓是湘軍主力，一戰被殲滅，文武官死四百餘人，兵卒死六千餘人。反革命所受打擊，止要看胡林翼自供就很明白，他說：「三河敗潰之後，元氣盡傷，四年糾合之精銳，覆於一旦，而且敢戰之才，明達足智之士，亦凋喪殆盡」。這兩次大捷，都由於陳李兩軍聯合作戰，此後陳玉成經營安徽，拒湘軍進圍安慶，李秀成守浦口，拒江南大營攻入南京，陳李兩軍各當大敵，事實上不能機動佈置互相救援了。

陳玉成安慶保衛戰

咸豐九年，曾國藩同林翼定策，合湘楚兩軍水陸全力，四路進攻安慶。陳玉成聯合張洛行隴得割

等搶軍十餘萬人奮力抗擊，激起革命反革命空前激烈的戰鬥。正當兩軍在太湖潛山一帶惡鬥，十月，池州（貴池縣）守將章俊投降湘軍，「情願收取蕪湖、太平關、建德等處，立功贖罪」。這個無恥的叛賊「久踞池州，所部不下數萬，強悍衆多」；「且係狗逆（會胡極怕陳玉成，呼爲四眼狗、狗逆以洩忿）舊屬，於用兵機謀，早能窺破」（胡林翼致楊載福書）。會胡如獲至寶，賞他一萬兩銀子，一個「遊擊」虛銜，他也表示「投誠歸順，無有二心，請調赴皖北，以圖報效」。他要取得信任，對玉成軍確起了極大的破壞作用。九年十一月，兩軍大會戰，十年正月，玉成軍戰敗。胡林翼稱這次戰爭爲「軍興數年來僅見之大戰」（克復太湖縣城疏），「此次血戰似係軍興以來未有之奇，他省兵將似難如此堅強果毅」（復官文書）。當「前敵軍情，萬分吃緊」的時候，急得會國藩幻想「狗已冥誅」，胡林翼急得「近月肝氣決裂，見兵將尙和，見吏則怒不可解，有痛罵不堪者，自知太過而怒不可遏，大約是病矣」（致會國藩書）。大戰的結果，太平軍失去太湖潛山兩個縣城，湘軍會國藩進駐賢關，開始圍攻安慶。

陳玉成戰敗退軍，會合李秀成，攻破江南大營。胡林翼料到太平軍秋後定要反攻，惶恐地說「不過三個月，狗枝又壯，狗胆又雄，楚其肝食矣！又終是天下之禍根，弟苦心焦思六七年矣，竟未能屠滅此賊」（致丁月台書）。五月，他請求咸豐帝允許添募湖南勇丁說「去冬今春兵力夫分，四眼狗陳玉成以十萬之賊，西犯以救潛山太湖，臣等與會國藩合力圖謀，血戰月餘，屢瀕於危，幸而勝之。今則江東各路全軍破敗（指江南大營潰散），賊勢既無所顧忌牽綴，必挾全力全勢悉數西犯以謀楚軍，是楚北皖北之危迫情形，不得智士而知之矣」（奏陳等撥招募並軍情賊勢縷晰情形疏）。他竭力籌備戰守，嚴密戒備，趁玉成軍在下游，催促楊載福、彭玉麟水師攻取樞場。他說「樞場爲安慶之吭首，

不得縱陽，不能合圍，即再頓兵十年，不能制賊要害，亦不關賊痛癢」。五月，楊彭督率章俊部血戰攻破縱陽。這個叛賊立了大功，胡林翼寫信給會國藩說：「章軍血戰，勞苦功高，幸而得之，爲安慶謀，則此功極大，戰績良苦。」要會國藩令章俊重兵守縱陽，並保薦他得官職，太平軍失縱陽，安慶形勢愈益危急。

九十月間，玉成率黃文金、楊輔清、吳汝孝等軍，聯合捻軍龐得樹、孫奎星等十餘萬人救安慶。會國藩被猛攻，準備撤退圍城軍，章俊自縱陽出兵斷絕練潭餉道，玉成軍乏食，國藩用章俊計，屢獲勝利，玉成退歸桐城。

與玉成救安慶同時，李秀成自浙江回南京，奉天王命援皖。江西湖北各州縣起義首領四十餘名，派人向秀成「公呈降表投軍」，約定接應太平軍。秀成軍攻破皖南黟縣，入浙江轉向江西進發。

咸豐十一年春，陳玉成直搗胡林翼的老巢——武昌，李秀成直搗會國藩的老巢——祁門，造成太平軍與湖楚軍戰爭以來最緊張的一次大戰。陳玉成軍自桐城經霍山縣攻入湖北，沿途打敗守軍勢如破竹。二月，攻克孝感、黃州、德安、隨州、黃安、黃陂等城，民衆武裝響應，僅德安一處，就有二萬二千餘人。當時胡林翼率楚軍駐太湖，助會國藩圍安慶，不曾想到玉成行軍「風馳雨驟，晝夜兼行」，飛調水陸援軍，一時緩不濟急。武昌城總督滿人官文，昏聩無能，守城旗兵綠營兵總數不滿三千。他料定武昌必失，大勢已去。本來太湖大戰，已經嚇成大病，這一次悲觀已極，索性連「軍報亦廢擱不閱，五心燒熱如火炙，夜間尤甚，咳嗽吐濃紫色血」，希望速死（八月裏吐血死去），說「生死之際，如倦極思得一睡，睡着便安，即沒吾寧也」（與會國藩書）。這個危局怎樣得救呢？咸豐八年，英國在漢口取得租界，它用武力阻止陳玉成渡江取武昌，把一羣反革命從絕處救活了。玉成分兵協

助人民守城，自率萬餘人回救安慶。

李秀成屢破會國藩軍，二月攻克景德鎮，絕會軍餉道。會國藩是向來不上戰場的，這時候急了，三月，親到休寧督各軍攻徽州城，希望打通浙皖交通線，一場大敗，逃回祁門。秀成軍圍祁門猛攻，會國藩困守絕望，寫遺囑給妻子，準備自殺。這個漢奸頭子三次尋死，靖港、鄱湖是倉皇失措，這一次是計窮力竭，形勢比前兩次更嚴重。自然，所有漢奸都拚命救他，左宗棠在樂平打了大勝仗，秀成撤圍入江西，攻克大部分郡縣，把安徽放鬆了。他有江西湖北起義首領和民衆接應，行軍順利，五月，由吉安、瑞州進佔修水、武寧，逼近湖北。胡林翼全力抵禦，節節敗退。六月，秀成佔領興國、大冶、通山、通城、蒲圻、崇陽一帶城池，武昌萬分危急，嚇得在太湖的胡林翼「咳逆彌甚，嘔血日至升餘，形銷神瘁，氣息奄奄」（奏陳病勢增劇懇請開缺調理疏）。秀成無意進攻武昌，長江被湘軍水師封鎖，也不能渡江到北岸，望見楚北的玉成軍旗幟，無法會合。他收得起義民兵三十萬，退出楚南，經江西攻入浙江。

三月間，玉成率馬步精兵回救安慶，與會國荃水陸軍大戰，不能取勝。他留下劉璣林率「平日第一枝悍黨，戰守可恃」（會國藩語）的精兵守集賢關營壘，自己去南京求救。五月，會軍攻破集賢關，劉璣林被殺。這次戰敗，損失異常巨大，會國藩說「查粵逆自滋擾以來，我軍所斬長髮老賊，至多不過數百名。此次殲除長髮老賊至四千名之多，實爲從來所未有」（軍官圍攻赤岡嶺賊壘悍賊殲除摺）。胡林翼說璣林是「悍孽著名，四眼狗所依賴，此次就擒，老賊誅戮殆盡，功抵塔忠武（塔齊布）岳州李忠武（續賓）九江矣」（致會國藩等書）。玉成得到敗報，趕回再救安慶，但精銳喪亡太多，雖經幾次血戰，仍不能挽回頹勢。八月，安慶終於陷落了，守將葉芸來率全軍戰死。

陳玉成想去湖北招兵，「不意將兵不肯前去，那時兵不由將，連夜各扯隊由六安而下廬州，英王見勢不得已，亦是隨回轉到廬城。英王見勢如此，主又嚴責，革其職權，心煩意亂，願老於廬城故未他去。坐守廬城，盡忠於國」（李秀成自述）。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四月，廬州失守，玉成率殘兵往壽州，被團練苗沛霖誘獲，獻給清帥勝保。這個太平軍兩大支柱之一的英王爲革命犧牲了！他死時還止有二十六歲。

陳玉成的主要對手是胡林翼，他怎樣畏懼玉成呢？他說「賊勢較石逆爲少，賊計較石逆爲狡爲悍」（致金觀察書）。他尤其畏懼玉成的深得民心，在致羅澹村信裏說：「昔年民欲賊來，不肯清野，近年民不願（？）賊來，然尚不肯清野也。欲清野，尙待創深痛鉅之後。」於是自己率領一羣民賊來製造「創深痛鉅」，致州縣官要「居今日而圖治，非用霹靂手段不能顯菩薩心腸，必須棘手示懲，使知畏法」（復襄陽縣賀月樵），這等於說「不聽反革命的命令者殺無赦」。又教軍官放火燒城，說「得城之時，密派勇丁各持一炬，將城內大小房屋米糧付之一炬，片瓦不留，則異日必無賊可守矣」（復吳幹臣）。統治階級推崇備至的「胡文忠公」，就是這樣指導殺人放火的一個強盜，他還強迫文武官員搶糧，在札余副將峯山縣裏說：

查霍山樂兒嶺附近等處，士民無仇賊之心，有助賊之意，將所有穀米屯聚，不碾不售，以致兵食缺乏，試問是何居心？應由余副將嚴查有穀有米之家，出示封鎖，勒令運營出售。如該處士民始終抵抗，其中必有不明太義甘心助賊，倡率阻糶之紳民。仰即查明網斬十數人，並將米穀充賞。倘該將有心討好，不知輕重緩急，姑息養奸，定將嚴參。

紳民有米不願出售，這就該「網斬十餘人」麼？他又不反省一下，有什麼紳民「有助賊之意無仇

賊之心」，不是官，實際是民賊，而所謂賊實際是民友的鐵證麼？自然，民賊是不能反省的，因為他們的頭腦是剝削階級的。試看他「致前敵各營書」：

粵逆竄擾以來，皖民受禍既久，迷溺尤深，誠恐軍行之際，賊黨造作謠言，蠱惑人心，果於從逆，亟應出示曉諭，破其從賊之惑，予以自新之途，亦解散賊黨之一法……俾其家喻戶曉，去邪歸順，實爲至要。

人民解放叫做「受禍」，覺悟叫做「迷溺」，當滿洲奴隸叫做「去邪歸順」，堅決反抗叫做「果於從逆」，這就是從民賊們特殊頭腦發出來的特殊言語。

民族英雄陳玉成被反革命殺害了，還被描寫成殘暴無比的「狗逆」，究竟誰是狗誰是逆呢？可看英國人令利「揚子江日記」：

此處（指南京上游大通地方）村落，荒苦不堪言狀，其破壞之遺跡，大部政府黨兵士蹂躪之所爲也。太平黨兵士之蹂躪，焚燬寺院，瓦礫無餘，此其遺跡，所在皆是。而政府黨兵士之蹂躪，則父老痛哭而談，以爲奸淫婦人，恣意殺戮，慘無人道。太平軍之暴行，不過強人民爲其運輸糧食，若凌辱婦人，則往往處以死刑，罪人之首，高揭於犯事之地。尤記太平軍之名將所謂英王者，謂其部下，不得妄取民間一物也。政府黨之兵士不及遠矣。

李秀成南京破圍戰

江南北大營是咸豐帝與曾國藩也是滿與漢矛盾的產物。咸豐帝的計劃是湘軍出力，江南北大營收功，因此對它特別重視，兵額增至七萬人，餉源指定江蘇、浙江、上海、福建、廣東、江西，幾乎佔東南財力的大部分。大營唯一戰將張國樑與和春成見很深；軍隊是滿人，兩廣人，各地土匪流氓的雜

合體；軍風紀是「將驕兵惰，終日酣嬉，不以賊亟爲意。或樂桑中之戲，或戀家室之私，或羣衆縱酒酣歌，或日在賭場烟館，淫心蕩志，樂極忘疲」（胡林翼飭各統帶查辦各營）。它逼近南京，形勢上成爲可怕的大敵。但實際大敵是上游的湘、楚軍。太平軍對江南大營應取守勢，可小攻不可大破，對湘、楚軍應陳李聯合，全力攻擊，首先要確保安慶。

咸豐十年正月，張國樑攻陷九洲要塞，南京震動。胡林翼給曾國藩信說：「江南得九洲，敵動一切，東南成功尙早，我輩自行其志，不睬他人」。曾胡看得很真切，一心爭奪安慶，李秀成却看錯了，定策消滅大營。秀成率精兵自皖南攻入浙江。二月，破杭州城。大營分兵救浙，秀成軍從間道馳回南京城外，玉成軍也從上遊來會。閏三月，大破江南江北兩大營，和春張國樑敗死，大營潰散。

這次戰爭在革命反革命變方都是重要的關鍵。太平軍方面，李秀成着重下游用兵，想佔領江浙兩省作根據地，他到江兩湖北，是招收援軍新兵，目的不在爭奪上游。陳玉成往來江北成了孤軍，得不到秀成軍以有力於援助。從此太平軍形成江南江北兩個獨立軍，勢力分散，江浙軍事勝利，反加速南京的陷落。反革命方面，咸豐帝計劃失敗，不得不全部依靠曾國藩，給他兵部尙書銜，署理兩江總督的軍政實權，指揮統一了，餉源充裕了，反對派不敢爲難了，湘軍的勢力和地位從此大進一步。左宗棠聽到大營潰散，歡喜道「天意其有轉機乎！江南大營將蹙兵疲，豈足討賊，得此一番洗蕩，後來者庶可以措手耳。」胡林翼聽到曾國藩得兵權政權，喜歡道「滌帥誠得督符兵符，則否極而泰，剗極而復，天下士氣爲之一振」。反革命的喜歡就是革命的悲哀，李秀成還在注目江浙上海，不急救安慶，敗局不可挽回了。

後期革命形勢——破圍失敗

安慶失守，南京危在旦夕，正是本軍振作精神、死裏求生的緊急關頭。李秀成是向這方面努力的，可是洪秀全和洪氏集團裏腐化的習氣太深，眼中止看見南京一座孤城，心中止依賴天空一位上帝，拒絕李秀成棄城流動，向遠大處現實處開新環境的建議，終不免於亡國慘運的迅速到來。

楊韋內訌後，洪秀全在精神上消失了永安以前的發皇氣象，也消失了內訌以前的信人勇氣，繼續增長的却是暮氣沉沉的保守思想。他要保守自己的地位，對臣下採取有疑忌沒有團結，有懲罰沒有愛護的消極手段。像李秀成陳玉成那樣忠義有功人人信服的大臣，却更遭他的猜疑，竟亂封九十多個王來互相牽制，防英忠兩王跋扈專權。結果人心不服（李秀成語），「各爭雄長，苦樂不均，敢不相救」（曾國藩語），太平軍呈瓦解現象。重要將領許多投降滿清，出死力攻擊太平軍，都成了滿清的猛將，這固然由於叛徒們無恥貪生，出賣革命，但秀全猜疑政策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洪氏集團專擅政權，把楊秀清時代建立的聖庫、聖糧制度破壞無遺。照李秀成自述所說：「我在京，洪姓不敢逼人，不敢十分強欺城中百姓，又不敢欺逼官兵。我不在京城，渠滿城逢屋查過，有米銀等物，任其取用，不敢與爭。日日按戶查尋男女（人口），不得安然。」就在最後一次圍城中，還是「各處要緊城門要隘之處，概是洪姓發人巡查管掌，我（秀成）在京並未任圍城之事」。見秀成「慈愛軍民，恐有圍害國之心，謬言我（秀成）忠而變奸」。李秀成說「今日之國破，實洪姓之自害也」，事實上洪氏集團正是秀全猜疑政策的一種表現。

洪秀全和洪氏集團本身並無兵刀，不能抵禦反革命的攻勢，握兵權的李秀成，軍事上自有一種見解，與洪秀全不合，對洪氏集團更是嚴重的對立。太平軍內部紛歧，力量分散，大局無法挽救，但天國還能延長三年，這全靠李秀成爲首的一枝軍隊對革命無限忠誠和江浙人民對革命的有力支持。

咸豐十年閏三月，秀成軍破江南大營，追擊潰兵，四月取得常州，（蘇州嘉興等地，江浙肥沃地區大部分歸入天國領土。這種意外迅速的戰勝，與其說太平軍的勇猛，不如說人民力量的偉大。例如李秀成到蘇州城外，「百姓多有來迎，街上舖店民房，門首俱貼字樣云：同心殺盡張和兩帥（原文當是賊字）官兵」。秀成在新領土施行善良政治，民心悅服，合力守衛解放地區。滿清江蘇巡撫薛煥勾結美國人華爾率洋兵進攻青浦縣，秀成率兵迎擊，「兩陣交鋒，鬼兵大敗，殺死鬼兵六七百兵人，得其洋槍二千餘條，大砲十餘條，洋刀三百餘口，舟隻數百餘條，當解青浦之圍」（李秀成自述）。乘勝攻克松江，進兵至徐家匯離上海十八里（會國藩也承認「上海舟師大挫，危迫殊甚」）。英法兵替滿清守上海城，秀成準備進攻，因嘉興方面軍情緊急，退兵救嘉興，上海解圍。

這一次追擊戰，是洪秀全、陳玉成解救安慶的計劃。原計劃是「派楊輔清、李世賢、李秀成等直取蘇常，再攻徽浙，以入江西；又派吳如孝、張洛行，由定遠、壽、潁、六、霍入湖北，定於秋間，四路大舉」（會國藩安慶軍營搜獲陳玉成自南京發來密件）。這計劃確打中了滿清的要害，反革命全體大恐慌，議論紛紜，都注目到下游地方，咸豐帝認爲湘軍「規取安慶，頓兵堅城，即使安慶得手，亦屬得不償失」，嚴令「會國藩接奉此旨，即統率所部兵勇，徑赴蘇州，以保全東南大局，毋稍過誤」（十年四月上諭）。老奸會國藩胡林翼是不動搖的，他把湘楚軍主力死釘住安慶，奏稱「但求立脚之堅定，無論逆氣之增長」（會國藩通籌全局並辦理大概情形摺），一面保薦左宗棠、李鴻章、沈

葆楨分任浙蘇贛三省軍務，自己督大軍全力進攻安慶，洪陳計劃被曾胡破壞了。

李秀成似乎不會參與洪陳謀議，自述說「自六解京圍（江南大營潰散）之後，息兵三日，天王嚴詔下頒，命我領本部人馬，去取常蘇，限我一月肅清回奏。人生斯世，時爲其用，不得不從」。他出兵是勉強的。後來用兵順利，民情愛戴，又見物產富饒，洋兵易打，產生取江浙作根據地的思想，對上海甚至南京比較看輕了。九月，陳玉成在安徽大戰，「天王嚴詔頒到，命我赴上游，催我領軍而掃北。由蘇動身到京，將來情啓奏，不欲掃北。我主盛怒，責對難堪。此時亦無法處，出師而上江西湖北」（李秀成自述）。是時江浙並無大敵，曾胡又不曾中計，調秀成軍援皖是完全必要的，不過那種強迫命令的方式，使秀成不能忘情江浙，咸豐十一年上半年經江西入湖北，收新兵三十萬，石達開部逃兵二十萬，又回到浙江來。陳玉成在皖北戰敗，奏調秀成兵千餘人助守安慶，秀成不甚願意，並預料「其省不能保也」，集賢關慘敗後，又不發大兵助玉成恢復實力。安慶失陷，秀成至少要負敗不相救的責任。

安慶失陷的危險性與曾胡的戰略目標，秀成沒有足夠的認識，加深了洪秀全及洪氏集團對秀成的猜疑與裂痕。洪秀全的戰略思想着重在上游，用兵江浙止是牽制性質。咸豐八年三月滿清與英法（兩個主要侵略者）訂天津條約，出賣長江流域，十年九月，又訂北京條約，更進一步合作來反對革命，秀全深知這種情形，用兵限於江浙內地，不攻上海，避免與侵略者直接衝突（自然，侵略者還是要進攻的）。賴文光說「忠王李秀成，不知君命，而妄攻上海，不惟攻之不克，且失外國和約之大義，敗國亡家，皆由此舉」（賴文光自述）。忠王經營江浙，顯然與秀全意見不合，是違反「君命」的自由行動。洪李間失和，雙方都該負責，但在力爭上游這一點，秀全並不錯誤。曾國藩稱「洪逆老於戎

行」，是見反革命是認識他的。

李秀成於十一年六月，自湖北經江西攻入浙江，克浙東各府縣，十一月，克杭州省城，浙西相繼攻克，浙蘇兩省膏腴盡爲秀成所有。曾國藩稱「江浙賊勢浩大，盡占富庶之要區，廣收官軍之降卒，財力五倍，人數十倍」，太平軍的聲威，確把一切反革命駭倒了，連曾國藩也動搖起來，要曾國藩遵旨去救蘇杭。國藩却說「不然，金陵爲賊之根本，我急攻金陵，賊必以全力援護，而後可以圖蘇杭之地」。國藩因此又持原定計劃，派國荃到湖南添募新勇，準備進攻南京。滿洲主子西太后給國藩節制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四省軍政大權，並公開宣示「江浙等省軍務朕惟曾國藩是賴」；這是滿洲皇帝第一次對漢族奴才低頭，但這個奴才有誰可賴呢？當然，他止有向外國侵略者屈膝求賴。

曾國藩的計劃首先依賴外國侵略者保護上海，說「目下清勢，舍借助洋兵，亦實別無良策」（同治元年二月遵旨通籌全局摺）。其次是想乘太平軍英勇抗擊侵略者的機會，從中取利。他說「臣處搜獲偽文，亦知金陵洪逆，詞意不遜，與洋人構衅甚深。在洋人有必洩之忿，在中國爲難得之機，自當因勢利導，彼此互商，嘉其助順，聽其進兵。乘洋人大舉之際，我兵亦諸道並進，俾該逆應接不暇，八方迷亂，殆亦天亡粵逆之會也」（三月籌議借洋兵剿賊摺）。他又規定對洋兵應取的奴隸態度，說「臣當諄飭部曲，平日則言必忠信，行必篤敬，臨陣則勝必相讓，敗必相救，但有謙退之義，更無防範之方」（六月議覆調印度兵助剿摺）。他那種對太平軍幸災樂禍，對侵略者奴顏婢膝的漢奸民賊思想，被一切反革命分子奉爲典範，李鴻章、左宗棠都依樣實行了。李秀成叙述當時漢奸軍「忠信篤敬」的情況說「鬼兵到太倉攻打，外有清軍前來助戰。打入城者，鬼把城門，凡見清官兵，不准自取一物。大小男女任其希盡，清官兵不敢與言，清朝官兵多言者，不計辦官職大小，亂打不聽」。但漢

奸軍還有另一副兇殘面目，李鴻章與彭玉麟書說「該軍（常勝軍）往往破賊，而不能多登賊，故征我軍偕伴，以輔其力所不逮也」。這樣絕非人種所有的殘忍性，甚至戈登也以爲太甚，斥責李鴻章，鴻章的答覆是「此中國而非歐洲也」。這就是說按照中國統治階級的特性應該瘋狂屠殺中國人民。

李秀成佔領江浙，外國侵略者當然要武力干涉。同治元年三月，李鴻章率淮軍八千人到上海，聯合英法軍「常勝軍」開始對太平軍作戰。太平軍抗擊反革命聯軍，勇敢堅決，充分表現中國人民無限的英雄氣概。反革命聯軍有強大的力量：第一、英國法國駐滬陸軍配備着當時最新式的武裝，有英法反動政府作後盾，聲勢最盛；第二、美國流氓華爾統率的「常勝軍」，人數約五千，外國軍官約一百五十人，軍餉每年多至九十萬兩，每攻下一城，滿清酬華爾本人銀三萬或三萬六千兩（戈登攻下蘇州酬銀八萬兩），將佐兵士得大掠城中財物人口，作爲酬報。「常勝軍」是一枝新式武裝的強盜軍隊，有居住上海的官僚、地主、買辦、紳士、商人作主要後盾，這些人把華爾當作救星，大商人楊坊送女兒給他，鼓勵他的戰意。李鴻章統率的淮軍是一枝屠夫軍隊，武器用外洋槍砲，專跟在外國軍隊後面補充殺人並搶掠剩下的財物。它有整個統治階級作後盾，被認爲江蘇方面的主力軍。這個聯合軍是反革命的結晶體，力量不容輕視，但李秀成却打了一連串的勝仗，不曾失敗過。聯合軍一敗於太倉，再敗於嘉定，三敗於青浦，法水師提督曾羅帖戰場斃命，英法軍樂嘉定青浦兩城逃走，李秀成說「那時洋鬼並不敢與我見仗，戰則即敗」，確是事實。不過戰爭勝利，並不能挽救南京的危急。

正當秀成在下游用兵，五月，曾國荃圍逼南京，紮營雨花台附近。天王調秀成軍來援，秀成集衆將會議，議定「待二十四個月之後，再與曾國荃決戰」，天王急了，「差官捧詔來催。詔云，三詔追救京城，何不啓隊發行？爾意欲何爲？爾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詔，國法難容」。秀成被迫

救南京，閏八月，親率大軍三十萬號稱六十萬進攻圍城軍，大戰四十六日，會國荃死力抵禦，會國藩飛調「常勝軍」應援，「常勝軍」不敢前來，形勢確極危急。秀成軍因「未帶冬衣，九十月正逢天冷，兵又無糧」，部下各王不肯齊心合擊，會國荃得微倖守住營壘。「自攻未下，我主嚴責革職，調我當殿明責，即飭我進兵北行，不得不冒雪而往」（李秀成自述）。當時上游反革命兵力薄弱，賴文光、陳得才在湖北河南陝西行動，聲勢浩大，洪秀全派秀成北進，會合賴陳軍，從上游來解救南京，原不失爲一個計劃。可是疑忌秀成過甚，既傷他的威信，又奪他的兵權，調遣秀成「手下各將，任王次兄洪仁達亂爲」，江浙留守軍，無人調度，任其自行。君臣上下互相疑怨，離心離德，全局更接近瓦解的形勢。秀成率孤軍轉戰江北，進到安徽壽州。會國藩無法，定計「急爭金陵老巢，以攻其所必救」，同治二年五月，竭全力攻破雨花臺及聚寶門外諸石壘。那時「京內驚慌，天王差官捧詔，召我（秀成）回京，當即分軍回轉」，軍士戰死、落隊及飢寒病死前後失去十數萬人，戰鬥力大受損傷。

南京陷落，這時候已經決定了。李秀成建議：「內少糧草，外救不來，讓城別走」。棄城別走有兩個方向。走向上游聯合賴陳軍、捻軍回軍、在北方發展，證以後來捻回的強大，建立新國不是不可能。走下游佔江浙閩粵沿海各省，利用同情革命投効太平軍的不少外國友人，運入新式軍火，繼續抵抗反革命聯合軍，也可以支持危局。會國藩深怕太平軍「變爲流賊，更難收拾」，足見秀成這一建議是可以實行而有效的計劃。在反革命方面，當時湘軍已是精疲力盡，矛盾到處發生。首先是滿洲主子對會國藩的猜忌。會國藩滌陳餉緝情形片說「論兵則已成強弩之末，論餉則久爲無米之炊，而戶部奏稱收支六省巨款，疑臣廣攬權利。臣雖至愚，豈不知古來竊權利者，每遭奇禍。外畏清議，內顧身家，終夜悚惶，且憂且懼。」其次是湘軍本身腐化沒落，「臣帶兵九年，今年始有餉贖兵逃之事」（

同治二年曾國藩近日軍情並陳餉絀情形片），湘軍初起「用儒生將農人，今則所謂儒者不儒，農者不農」（湘軍志營制篇）。其三是新起的左宗棠老湘軍、李鴻章淮軍自成勢力，用兵各主已說，不受曾國藩調度（湘軍志曾軍後篇）。反革命陣營有這許多裂痕，如果洪秀全聽從秀成的建議，自率一軍北進聯合捻軍，命秀成回江浙團結部屬，攻擊沿海各省，南北呼應，重振戰局，滿清必然驚慌失措，即使調湘軍追擊，在滿漢矛盾下（北方清帥管文、僧格林沁地位比曾國藩高；仇視湘軍），曾國藩喪失漢奸信用，無法再施展湘軍的長技（湘軍失長江水師又無馬隊，戰鬥力減去大半），無疑的要潰敗。可惜洪秀全疑秀成有異心，更着重防內變，不放秀成出京，君臣困守危城，坐待滅亡，給左李在江浙方面順利地擊破各個孤立的太平軍守將。

左宗棠攻陷浙江省

同治元年正月，左宗棠從安徽進入浙江衢州城（滿清在浙江唯一的城池），太平軍大將李世賢阻擊左軍，到六月，左軍還不能出衢州境。閏八月，世賢圖援南京，左軍才得沿錢塘江進攻，浙江的失陷，左軍和江蘇李鴻章軍一樣，都是跟在外國反革命軍後面，做殺人、收地、搶掠的工作。外國反革命軍的取得勝利，却因太平軍失去李秀成的領導，各城孤立無援，軍心動搖，沒有整個戰守計劃。浙江失陷，不從左軍入衢州城開始而是從英法軍攻陷寧波開始。

同治元年四月，英法軍艦砲擊寧波城，英法陸軍聯合滿清寧紹台道張景渠所率海盜攻城，太平軍退至鄉間抵抗。李鴻章請華爾自上海率「常勝軍」往援英法軍，至慈谿縣（離寧波三十里）被太平軍擊斃。

閏八月，花旗國副將法爾師德輪船到定海，會同官兵民團合剿「海盜」（左宗棠定海兵團會同輪

船艘捕海盜情形片)。

十月，「法國因寧波海口吃緊，願將伊國副將勒伯勒東權受中國職，任帶兵防剿。該副將在寧波所練中國兵丁一千五百名籌給餉項，即行按照舊章（「常勝軍」舊章）支放」（發給勒伯勒東專劄憑片引上諭）。

十一月，上諭「左宗棠、李鴻章奏中外官軍（可恥的名稱！）攻克上虞縣城一摺……惟據法國哥士耆爾及蕪城竟日，而城中絕無動靜，遣人往視，始知賊已宵遁。與此次所奏官兵奮勇登城，賊由西南逃竄情形不符。與外國人共事，全在乎以誠信，若稍有粉飾，即爲所笑，嗣後務須據實詳報，不得一字虛假」。反革命首魁曾胡左李都是這樣的一個騙子，止是這一次不幸被外國反革命揭穿而已。

同治二年正月，上諭「據李鴻章等奏，英國撥派白齊文，法思爾德會帶「常勝軍」，法思爾德部現往寧波防剿等語。花旗國副將法爾師德是否即法思爾德」。

正月，署總兵勒伯勒東傷故後，洋將賈勇勸繼之。臣飭蔣益豐一軍會同洋將進規紹興，密囑蔣益豐與洋將共事，惟守禮示信，勿計功攘利，致啓爭競之端（奏報連復六縣布置情形摺）。

二月，上年勒伯勒東傷故後，法國參將賈志勸權受中國副將職任，來寧接帶該營兵勇。英國總兵咭樂德克親運大砲到營籌剿紹郡賊匪。正月初一日，咭樂德克、賈志勸帶領洋兵花綠頭各勇，車輪大砲徑攻西郭門。突有黑洋人五六十名助賊施放洋槍，彈入賈志勸腦左，登時殞命。（查明法國參將陣亡請卹摺）

五月，富陽久圍不下，增募外國軍助攻（湘軍志浙江篇）。

八月，迭次助剿最爲出力之英國領事夏福禮、總兵咭樂德克，法國參將德克祥，稅務司日意

格、教主田雷思等九員，臣細加考核，克復各城，外國官兵實屬出力（外國官兵助剿出力請酌賞物件片）。

八月，楊政謨率水勇，德克碑率砲勇。此次中外官軍會攻富陽，其苦戰克城，以法國總兵德克碑爲最（奏報克復富陽縣城摺）。

據李成自述，鬼子兵攻破寧波得賞銀之後，又領賞銀來打紹興，錢塘江上游太平軍恐後路斷絕，陸續放棄金華、龍遊、嚴州、溫台等地，退屯富陽。左軍才得順流而下，請鬼兵山水路攻城，配合鬼兵砲隊，連戰數十仗，鬼敗，又調鬼兵多來，攻破了富陽城，秀成自述與湘軍志符合。

十二月，洋將德克碑帶花勇前來助剿，並令淺水輪船點放開花大砲（攻剿杭州餘杭情形摺）。

同治三年二月，德克碑開放大砲，轟塌城堞數丈（附陳杭州餘杭攻剿情形片）。

三月，法國參將德克碑此次助攻杭城，每次攻剿，極肯出力，杭城克復，實著勞績。臣等給敘銀二萬兩，分賞所部「常捷軍」出力弁兵（洋將助克杭城出力擬請獎賞片）。

以上都是左宗棠勾結外國反革命軍（左與李鴻章不和，請法國人組織「常捷軍」與李對立）屠殺中國人民的一切自供，浙江人民就在這樣可恥的「中外官軍」共同屠殺下又被奴役了。

李鴻章攻陷江蘇省

華爾死後，美國人白齊文繼任。同治二年，英國人戈登代白齊文統率「常勝軍」，用英國大砲五十二門會同淮軍陷常熟、崑山等城。九月，進攻蘇州，「江浙各將告急，日日飛文前來，不得已又啓我主。主及朝臣要我助餉銀十萬，方准我行。我主限我下蘇杭四十日回頭，銀不交足，過期不同者，依國法而行」（李秀成自述）。秀成到蘇州堅守，十二月，見內部有變，出城逃回南京。蘇州失

陷。「常勝軍」乘勝攻破約五十城，所謂淮軍的戰功，就在跟着「常勝軍」大殺大搶。湘軍志說：「復蘇州時，主將所斥賣廢錫器至二十萬斤，他率以萬萬數」。容闈西學東漸記說李鴻章「有私產四千萬以遺子孫」，自然，大部分是後來貪污所得，不過在攻掠江蘇時，獲得大量財物，也是無容置疑的事實。

會國藩會國荃攻陷南京

江浙一帶太平軍一部分堅守湖州城，大部分轉入江西境。秀成帶來守城軍人數不多，因為南京食糧不能容納太大的軍隊。在危城中秀全疑忌秀成更甚，城內居民飢餓，「賊盜蜂起，逢夜聞城內砲聲不絕，搶劫殺人，全家殺盡，搶去家內錢物」。南京無法支持了。同治三年四月，洪秀全服毒殉國。六月，南京陷。轟轟烈烈的人民大革命因南京失陷，而暫時失敗了！李秀成奉幼主洪福衝出城牆缺口，不幸散失，洪福逃往湖州，秀成藏匿民間，奸人向清營告密，被會國荃捕獲。會國藩從安慶星夜趕來，親自審問。秀成並無多言，止說「速將紙筆來，吾當書之，吾史館實錄，爲爾曹焚掠盡，吾不述，奚以傳後」。他在囚籠中寫天國始末、本人戰績萬字，並不隱諱天王亡國的原因，也不隱諱本人對天王的不滿。這當然不是對敵人誹謗自己，而是想借最後一個機會流傳天國信史。（會國藩也不得不承認「情事真確」），給未來的革命人民留一悲慘教訓，用心是極苦的。萬惡的會國藩就把洪秀全掘出遺體，「戮屍焚化」，又把「萬古忠義」（天王寫四字封秀成）的民族英雄李秀成「凌遲處死，傳首髮逆所到各省，以快人（獸）心」（會國藩賊酋分別處治粗籌善後事宜摺），這已經是盡殘忍兇暴之能事，但會國藩還要對死者行最後的侮辱。他不僅刪去秀成自述至少一年，塗改字句不知若干，而且卑污到代造乞降語句和什麼「招降十要」「天王十誤」。會國藩明明說他「文理不甚通順」而這些

偽品恰文從字順，與真品顯出兩手，又明明說「自來元惡解京，必須誘以甘言，許以不死，李秀成自知萬無可道，在途或不食而死。」秀成如果真有乞降的意思，正可「誘以甘言，許以不死」，爲什麼怕他「在途不食而死」？會國藩所代表的這類人，自己穢濁黑暗，却畏忌別人的清白光明，定要讓死人也蒙些不潔才快意，真是狗彘不食其餘的可恥懦夫。